中國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的決策歷程與執行



黃文放

黃文放，一九三一年生，廣東人，一九四七年自穗來港，參加左派青年團體工作。一九四九年參加新華社香港分社工作。一九九二年離休，在新華社工作四十三年。在新華社歷任資料員、記者、採訪主任、研究室政治研究組組長、研究室負責人；副秘書長、台灣事務部部長。另任中共港澳黨史領導小組成員。一九八二年初，廖承志根據鄧小平指示，組織收回香港主權政策研究小組，向中央提出收回香港具體方案，黃文放是五人小組成員之一（組長是魯平）。現時職務爲香港政治評論員及廣東省政協常委。





中英兩國政府於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九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簽署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由當時的中國國務院總理趙紫陽與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分別代表兩國政府簽字。中共元老鄧小平(當時是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身份)、以及當時的國家主席李先念等出席了儀式。　　(新華社照片)



五、六十年代(文革前)中共中央港澳工作領導小組組長是周恩來、副組長是陳毅和廖承志，香港工作由「周陳廖」這個小組決策。圖爲周恩來與陳毅合照。



廖承志是長時期具體負責香港工作的領導人，是首任國務院港澳辦公室主任。



現任中國國務院港澳辦公室主任魯平。
(明報資料室照片)



中國前任國務院港澳辦公室副主任李後。
(C. F. Lam 攝)



中國前任國務院港澳辦公室主任姬鵬飛。
(C. F. Lam 攝)

中英會談其中一個場景，一九八三年七月的第二階段第二次會議，由以當時中國外交部副部長姚廣爲首的中國政府代表團，與以當時英國駐華大使柯利達爲首的英國政府代表團舉行會談。　（新華社照片）

中英兩國政府就香港問題聯合聲明的批准書互換儀式於一九八四年五月廿七日在北京舉行，由當時的中國外交部副部長周南與英國駐華大使伊文思代表兩國政府交換了批准書並簽字，圖爲周南與伊文思互相祝酒。　（新華社照片）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九日中英聯合聲明簽署當天，鄧小平會見戴卓爾夫人，闡述一國兩制的構想。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九日，中共元老鄧小平當時以中顧委主任身份與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等，在北京人民大會堂簽字儀式大廳向香港各界人士觀禮團致意（新華社照片）

· 中英聯合聯絡小組會議。　(明報資料室照片)

· 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會議。(C. F. Lam 攝)

中共總書記、國家主席江澤民(右)是中國現時掌管香港問題的最高領導人，圖爲他於九六年十二月十八日會見候任特首董建華。（新華社照片）

香港在英國統治下一百五十年後回歸中國。圖爲香港特別行政區首任行政長官董建華與香港最後一任總督彭定康於九六年底會晤後握手合照。（明報資料室照片）

香港浸會大學林思齊東西學術交流研究所於一九九七年五月十日至卅一日，一連四個周末主辦「中國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的決策歷程與執行」專題演講會，由黃文放先生主講。

上圖，左起：浸會大學校長謝志偉博士、講者黃文放先生、第一講主持人、浸大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副教授丁偉博士；下圖，黃文放先生、浸大歷史系高級講師鮑紹霖博士，鮑博士爲第二至四講的主持人。



·「中國決策收回香港是個痛苦的過程。」



·「香港的狀態從未像現在咁 fit！」



·江澤民說「井水不犯河水」，其實正是體現一國兩制的精神。



·「我對香港的前景是樂觀的！」

《中國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的決策歷程與執行》

黃文放

本書所表達之意見或觀點及其所有內容，並沒有經香港浸會大學作技術性認可或證明確實無誤，亦不一定代表香港浸會大學及林思齊東西學術交流研究所之立場。

中國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的決策歷程與執行

作　　者：黃文放

出　　版：香港浸會大學林思齊東西學術交流研究所

地　　址：香港九龍塘聯福道 34 號

電話：(852)2339　5352　傳眞：(852)2339　5128

URL: http://www.hkbu.edu.hk/~lewi

E-mail: lewi@hkbu.edu.hk

發行及承印：明報出版社有限公司

香港柴灣嘉業街 18 號

明報工業中心 A 座 15 樓

電話：2595 3215　傳眞：2898 2646

明報網址：http://www.mingpao.com

E-mail: mpp@mingpao.com

ISBN　：962-8027-04-2

序

香港浸會大學「林思齊東西學術交流研究所」於一九九七年五月十日至卅一日，主辦了四次專題演講會，邀請香港著名政治評論家黃文放先生，主講「中國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的決策歷程與執行」，這個公開講座的講題非常合時和吸引，研究所把演講內容輯錄成書出版，作爲香港回歸中國的歷史紀錄文獻。

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中國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這是史無前例的大事。這不單對香港有震撼性的影響，即使對整個世界來說，香港的回歸和「一國兩制」政策的實施也是舉世矚目的。就我個人來說，能夠在此時此刻生活在香港，不但見證這偉大的歷史過程，並且在某些程度上有參與的機會，實在是人生一大幸事。

我第一次接觸「香港回歸」這題目，應該是一九七九年。那年九月下旬，我蒙一位世叔伯的邀請，跟隨他與家人組織的旅行團到北京和杭州觀光。那次旅遊雖屬私人性質，但適逢其會，我有機會在人民大會堂的一個招待晚會中，聽到廖承志先生有關香港問題的講話。我第二次訪問北京，是

在一九八四年的二月底。當時香港回歸已成定局。我應中國國家教委的邀請，與內子一同訪問北京、西安和上海幾間大學。但到達北京機場後，就收到姬鵬飛主任的邀請，在人民大會堂與他見面，就香港前途的發展交換意見。我記得那是一個星期六的下午，消息傳出後，霎時間我竟然成了新聞焦點人物，從香港來的記者長途電話響個不停，我才知道原來當新聞焦點人物是如此麻煩的。但也可能是因爲這次會面，所以同年十二月十九日中英聯合聲明簽署的時候，我也有幸獲邀到北京觀禮。當時我站在人民大會堂大廳的一角，親眼見證兩個國家的領導人在一份如此具歷史意義的文件上簽上他們的名字時，那種內心的震撼和肅然的感覺實在是難以形容的。

隨後我於一九八五年循九龍城區議會的間接選舉進了立法局，八六年又獲邀請進入行政局。雖然一九九一年以後我退出了政壇，但在那幾年中我有機會接觸到不少有關回歸的事情，對港英政府在這些事情上的看法和立場也有較全面的瞭解。同時，因爲我也參與了一九八五至九零年基本法諮詢委員會的工作，所以對「一國兩制」的構思如何落實，也提出過一些意見，而過去幾年我擔任港事顧問及參與特區政府籌委會的工作，對中英近期的爭拗也略知一二。

但在整件事情上，對於我來說，最空白的一段就是從一九七九至一九八四年的發展過程，也是最重要和耐人尋味的歷史過程。所以當我一知道黃文放先生願意以過來人身分，把這段歷程以公開演講形式闡述時，我就毫不猶疑，一口答應由浸會大學的「林思齊東西學術交流研究所」承擔有關

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左）去年在中南海會見浸會大學校長謝志偉博士。

的細節。

今天我藉個人的經歷來介紹這一系列公開演講，固然是說明爲甚麼我對黃先生的演講題目有這麼濃厚的興趣，但我相信，對這題目有興趣的人不只我一個。所以我們願意在前後不到兩周的時間內安排這演講系列，並且安排提供英語即時傳譯，以便將講詞的中、英文本輯錄成書，趕及在今年七月一日之前出版，無非是要讓關心歷史的人，對九七回歸的過程，及時得到多一份參考的資料。爲了這事，浸會大學許多部門的同事都增加了大量工作，我要特別在此向他們致謝。

謝志偉

一九九七年五月十日

出版說明

本書是根據本港著名政治評論家黃文放先生於一九九七年五月在浸會大學講述「中國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的決策歷程與執行」的演講錄音輯錄而成，並經黃文放先生親自審閱和修訂。

這一系列的專題演講是由浸會大學林思齊東西學術交流研究所主辦，並根據演講內容輯錄成書，趕及於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的歷史時刻，分別印行中英文版，以作爲香港回歸中國的歷史紀錄文獻。

黃文放先生在講話中披露了七、八十年代之間中國政府就九七年收回香港的決策過程、中國對九七後香港實施「一國兩制」特殊政策的構思與爭論、中英談判期間的爭論，以及講述他對香港前景的看法。

書中並附錄了黃文放先生近期所寫四篇與本書內容有關的文章，這對闡述有關問題更具系統。

爲期四次的公開演講，場內提供即時傳譯，本書的英文本是根據現場的即時傳譯同時依據經黃文放先生審閱的中文版內容輯錄而成。

由演講至出版成書，前後不過兩個月時間，這是浸會大學多個部門包括校長室、大學公關處、翻譯中心、歷史系、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以及林思齊東西學術交流研究所的同事們共同努力的成果，這裏，特別感謝的是校長助理陳露玲小姐，她參與並承擔了四次演講會的英文即時傳譯以及本書英文版的編輯工作。

鳴謝：書中部分圖片蒙《明報》資料室借出，謹此致謝。

目錄

第一章　中國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的決策經過、構思與爭論



鄧小平與廖承志攝於一九八三年五月。（新華社照片）

研究中國收回香港主權問題，我是屬於最早的人員之一。最早參與中央收回香港主權工作是一九八二年一月。

中共中央書記處最後就收回香港主權問題拍板是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在此之前我做過一些準備工作，但當時尚未知道中央已作出最後決策。

我八二年一月到北京，參加起草收回香港主權具體方案，當時新華社香港分社知道這件事的只有三個人，包括第一社長王匡、第二社長李菊生、副社長祈烽，其他副社長還未知道。

事實上當時在北京也只有少數人知道這個內幕，其他人包括一些副總理和部長也不太清楚。

中國決策收回香港是個痛苦過程。因爲英國方面一九七九年提出這個問題的時候，中國剛剛度過「文革」危機，百廢待舉，仍處於一個非常困難的階段。

一九七六年，中國三位領導人周恩來、朱德和毛澤東相繼去世，年底，文革結束。中國當時正處於一個很艱難的情況，大批幹部未恢復工作，整個國家的政局非常動盪，如果不馬上解決一些經濟上的問題，到同年十二月時，全國機關幹部和國營企業都發不出工資。整個國家處於瀕臨崩潰的邊緣。

一九七八年，中共中央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糾正「文革」的極左路線，確定以經濟建設爲中心，提出了改革開放的思想。

同年春節，廖承志在北京主持港澳工作會議，糾正「文革」期間在香港工作上的錯誤，特別是「六七暴動」的錯誤，重新確定「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針，調整香港的人事組織，安排更充分地利用香港。

正在這時候，英國向中國提出解決香港「九七」問題。北京對此毫無思想準備。因此，中國一再奉勸英國暫時不要提這個問題，表明中國對此還沒有政策。但是，英國還是步步進逼。

麥理浩訪京提「九七」問題

英國向中國提出香港問題的官方行動，是從七九年三月麥理浩訪京開始的。

麥理浩當時向中國提出：現時距離一九九七年新界租約期滿還有十八年時間，但國際財團的貸款通常要十五年保證期，而香港政府過去批出新界土地契約，是批到九七年七月一日之前三天，因此，如果英國政府不能把土地契約批出超越一九九七年，香港就難以再發展。

當時，麥理浩向鄧小平要求中國政府同意，香港政府批出土地契約的期限可以超越九七年。鄧

小平當時答覆他說，這個不可以。鄧小平明確告訴麥理浩一個訊息，關於九七問題，中國現在未有政策，而且希望英國人不要太早提出這問題。

鄧小平對麥理浩說，到了九七年，無非兩個可能：一個是中國收回，另一個是維持現狀。但不管怎樣，中國都會採取特殊政策，充分照顧香港的特殊情況，請投資者放心。

這一段話，麥理浩是向香港公衆隱瞞了。

另一方面，中國政府官員到現在仍然刪去鄧小平講話的前兩句話，就是說香港到了九七無非兩個可能那兩句話。

英國第二個行動是一九七九年七月五日，英國駐華大使柯利達向中國提交一份《關於香港新界土地契約問題的備忘錄》。備忘錄內容主要是要求中國容許英國批出新界土地超越九七，並希望中國容許港督對新界的管治能超越九七，實際上是提出英國於九七年後繼續管治香港的問題。

接着是從八〇年五月開始，英國前首相卡拉漢、英國外交大臣卡林頓、掌璽大臣阿德金斯、前首相希思，陸續訪問北京，提出各種英方要求九七年後繼續容許英國管治香港的主張。

北京方面也淸楚知道，英國的政策是以新界「土地契約」問題爲突破口，企圖逼使中國與英國談判，延長對香港的統治。

直到一九八一年四月，中國政府還未作出決策，還期望英國不要提出這個問題，不要逼中國表態。



麥理浩爵士於一九七九年訪問北京，圖爲他在當時任職政治顧問的魏德巍(即後來的港督衛奕信爵士)以及簡悅強爵士陪同遊長城。(明報資料室照片)

英國外相卡林頓勳爵一九八一年四月訪京，獲得鄧小平接見。(美聯社照片)

八一年四月三日，鄧小平見英外相卡林頓。卡林頓繼續逼中國答覆怎樣處理九七問題，鄧小平對他說：「對這個問題現在不能說更多的話。」

鄧小平指示研究香港問題方案

鄧小平是在會見卡林頓之後才在共產黨內部發出指示：「香港問題已擺上日程，我們必須有一個明確的方針和態度。請有關部門研究提出方案，並盡快整理出材料，供中央參考。」

由此開始，中國才認眞地研究香港問題。中共中央書記處在一九八一年的四月和十二月，先後開了兩次會議，討論香港問題。四月的會議是醞釀，十二月的會議是決策拍板，決定於一九九七年時收回香港主權。

廖承志是長期負責香港問題的領導人，文革前中共中央有一個港澳工作領導小組，組長是周恩來、副組長是陳毅和廖承志，其中廖承志是常務副組長，關於香港的工作一直是「周陳廖」這個小組決策的。負責具體工作的是廖承志。文革之後，胡耀邦總書記也明確過，香港工作中央指定由廖承志領導。因此，鄧小平提出要「有關部門」研究方案，實際上就是由廖承志主持，廖承志根據鄧

小平的指示，召集了兩個部門——港澳辦和新華社香港分社來研究。

其實研究可能得出的結論無非兩個：一、中國於九七年收回香港主權，以及用甚麼辦法收回？二、維持現狀，以及用甚麼辦法繞過九七來維持現狀？

北京早期並無收回香港主權的考慮，港澳辦和新華社作為基層主管部門，長時期考慮的是怎樣維持香港的現狀。

解決澳門問題的方式

其中一個方案是以「澳門方式」解決九七問題。

一九七四年葡萄牙政變，政變後提出要放棄所有殖民地，要成爲無殖民地國家，屬於第三世界。當時葡萄牙準備把澳門交回中國。

我當時作爲新華社香港分社研究室的負責人，曾到澳門工作了三個月，研究如何處理這問題。作爲中國政府的立場，如果葡萄牙政府說不要澳門了，交回中國，中國是不可以不收回的，但如果收回澳門，立即就會影響香港，當時中國仍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香港剛度過六七暴動的恐懼，假如這時中國收回澳門，香港就會天下大亂。

我們當時千方百計使葡萄牙政府不要提出交還澳門的問題。但不可以由政府提出，於是我們找到澳門土生葡人的領袖宋玉生(已故)，由宋玉生到葡萄牙與總理私下溝通，達成一些諒解。

當一九七九年中葡建交談判時，中葡兩國達成四點協議：一、澳門是中國領土，主權一貫屬中國政府所有；二、澳門是歷史遺留問題；三、在適當時機通過中葡兩國政府談判解決；四、解決之前維持現狀。這就是解決澳門問題的「澳門方式」。

其實解決澳門問題是爲了不要在香港問題上引起震動。

因此，當英國人想逼中國談判解決香港主權問題時，中國很自然會得出一種思維：可不可以用澳門方式來解決香港九七問題。

其實嚴格說來，九七的期限是沒有道理的。中國從來都不承認三個不平等條約，又怎會承認其中涉及九七租借期問題的條款呢！

因此我們長期的思維是，有沒有辦法繞過九七問題，我們認爲在法理上是可以的，因爲三個條約我們都不承認，其中的條款也不存在。我們從來都認爲，香港問題包括港九新界問題是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我們可以用澳門方式的辦法繞過九七來解決香港問題。

我們在香港與英國方面有很多非正式的溝通，希望將來通過一定機緣，進行某種形式談判，使雙方達成協議，同意香港從來是中國領土，主權應屬中國政府所有。而當條件未成熟時可維持現狀。但英國人不同意，他們認爲英國管治香港的法理根據是三個條約，如果沒有三個條約，就沒有

了法理依據，因此希望通過中英之間的正式談判，容許英國繼續管治香港三十至五十年。

我曾經跟英國人說：你們要懂得，愈是模糊的、原則的、抽象的、有默契的，往往會更好地解決問題，如果一定要講清楚，只會把中國逼上一條立即收回的道路。英國人的看法不同，他們認爲，七九年時是逼使中國低頭的最有利時機。

當中國最後作出決策時，麥理浩於一九八二年一月約晤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王匡，提出以下意見：一、香港的經濟繁榮是依賴英國的管治而取得的，如果沒有英國管治，香港人與全世界人都對香港沒有信心，香港的經濟就會崩潰。

二、中國現正實行改革開放，要盡快發展經濟，而香港能對中國作出重大貢獻。

三、希望中國想清楚，怎樣進一步充分利用香港。

英國人認爲，當時中國文革剛結束，要盡快發展經濟，需要充分利用香港，因此有條件逼使中國作出決定，由英國人繼續統治香港三十至五十年。

英國方面完全不明白中國的民族主義情緒是非常強烈的，中國共產黨在民族主義問題上、在領土主權上，從來是非常堅持、非常固執的，而英國的做法實際上是不讓中國有任何下台階，因此中國不能不重新考慮實際的做法。

根據鄧小平的指示，在廖承志領導下，首先召開了一個會，與會者包括港澳辦、新華社、調查部、經貿部和中國銀行，共五個單位。港澳辦和新華社是主管部門，調查部是當時中國正式的情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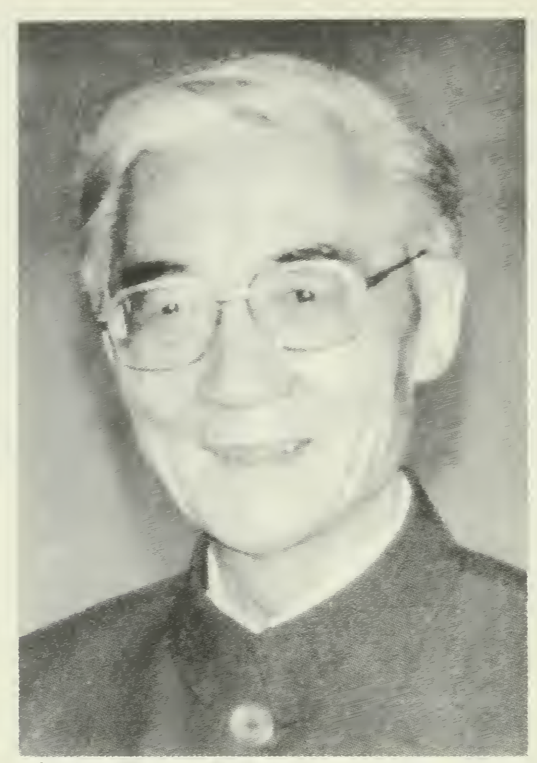
機關。這個會當時稱爲「神仙會」，是由廖承志篩選出認爲信任得過的人參加。

會議開始時未有甚麼答案，覺得有個矛盾：收回香港主權是簡單的，但要保持香港的安定繁榮非常困難。收回香港主權後能否繼續保持香港的安定繁榮？能否繼續保證香港爲中國所用？抑或會成爲中國的包袱？這個矛盾解決不了。

在這個神仙會中，新華社香港分社提出的方案只有一個，就是以澳門方式維持現狀。港澳辦因爲接近北京，知道高層在兩個方案之間有猶豫，因此港澳辦備有兩個方案：包括收回香港主權和維持現狀，預備視會議醞釀的情況而拿出其中一個方案。

章文晉慷慨陳詞

經過討論後，覺得英國人逼中國非要表態不可，中國方面實際上不可能再跟英國人再簽另一個不平等條約，而英國又拒絕接受其他可以轉彎的方案，他們認爲在這時候逼中國最有利。最後，當時的中國外交部副部長章文晉在會上說：「在這樣的形勢下，如果中國不收回香港主權，上無以對列宗列祖，下無以對子孫後代，內無以對十億人民，外無以對第三世界！」



章文晉當年一段慷慨激昂的陳詞，促成北京領導層作出九七收回香港的決策。（新華社照片）



前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第一社長王匡。（明報資料室照片）



前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第二社長李菊生。（明報資料室照片）

廖承志把這些話向鄧小平匯報，鄧小平說：「對，如果這個時候我們再不收回香港而再簽一個不平等條約，我們就都變成李鴻章了，任何一個政府都會垮台；中國領導人不可以做第二個李鴻章。」這樣，收回的意見成了當時的主導思想和主流思想。實際上，在很長一段時間，香港的幹部對收回香港主權仍是想不通的。

直到一九八二年五月份在北京召開的統一思想大會中，香港幹部仍覺得，收回香港主權是容易的，但收回後保持香港安定繁榮是很艱難的。本來共產黨內是要與中央思想保持一致的，但在收回香港主權這範疇裏，在會議上幾個香港的左派負責人都表達出行不通的意思。

當時香港工會一個負責人說，假如在左派工會投票，工聯會會員多數不贊成收回，有人還插口說，即使在中資機構裏投票也是不贊成的。會上並沒有人表示堅決支持北京收回香港主權的意思。因此會議第一期簡報比較灰暗。

當晚我與王匡、李菊生和祈烽商量，連夜找招商局的負責人袁庚，請他在翌晨第一個發言時，無論如何一定要說與中央一致，多說些支持中國收回香港主權的話，誰知翌日袁庚也沒有講這句話。

如前所述，中國收回香港主權是一個痛苦的過程，實際在那時是在沒有轉圜餘地下作出此決策。在神仙會作出決定以後，廖承志帶了港澳辦的負責人，包括副主任王魯明、秘書長李後，去找外交部黃華部長談，要取得一致意見，準備向中央提出收回香港主權。結果外交部表示同意，黃華

同意。

一九八一年四月，在廖承志主持下，由港澳辦與新華社的負責人起草一份呈交中央的報告，正式建議在九七年時收回香港主權，並提出了三條基本設想：第一個基本原則是，既要收回香港主權，也要保持香港安定繁榮；第二個原則是，收回香港主權後，要盡可能保留香港的作用，包括自由港和經濟制度都要保留，(當時尚未提到繼續實行資本主義這一條)；第三個原則是收回香港時，香港政府原有官員也不改變。

這是一九八一年四月中國共產黨內第一個建議中國在九七年收回香港主權的正式報告。接着，中共中央召開書記處會議，原則上同意這個意見，但未作最後決定。

再經過幾次醞釀後，到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正式拍板。這次會議由當時的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主持，出席的包括中央書記處成員、列席的有總理趙紫陽和外交部長黃華。胡耀邦主持會議時，首先轉達了鄧小平的意見，然後由廖承志作報告。

這次中央書記處會議就香港問題作最後的決策拍板。但即使在這樣一個決策會議上，最後趙紫陽還講了一句話：最衰是英國人，如果等中國國力更強大時才談這問題，不是更好嗎？可見這時候雖已作出最後決策，但仍有被逼上馬的感嘆。

鄧小平沒有參加八一年十二月這個會，但他帶來一句話：限廖承志三個月內交出解決香港問題的具體方案。

(這是至今中國的決策方式。科學的決策是經過詳細考證、驗證後作出決定，但中國最民主的決策方式也只是首長碰腦袋，幾個領導人開個碰頭會，腦袋一碰作出決策，然後回過來去考證是否行得通。)

根據鄧小平的指示，廖承志於八二年一月成立了一個聯合調查研究小組，研究九七年收回香港主權的特殊政策。我是這個小組的成員之一，小組的任務是要爲中央起草決策方案，驗證這方案是否行得通。這小組一共只有五個人，魯平是組長，具體決策由廖承志親自主持，小組成員中新華社香港分社有兩個人、港澳辦三個人。

廖承志當時同時負責起草對台政策，也就順理成章地把「葉九條」的內容移植到香港，成了解決香港問題方案的基礎。

五人小組在幾個月內做了大量工作，在香港和北京寫了二十多份非常詳細的研究材料，看是否行得通、每個政策應該怎樣做。

例如一個很大的問題是，九七年後港幣是否能繼續與國際貨幣自由兌換，這個研究報告是當時中國銀行香港管理處黃滌岩所寫，當時黃滌岩研究港幣已有幾十年時間。

事實上，港幣並非國際通用貨幣，如果九七後港幣不能與國際貨幣自由兌換，中國所得到的外匯就全部變成了人民幣。

當時剛好國務院開會談外匯問題，在北京的中國銀行官員問我，中國從香港得到的外匯收入究

竟比重多大？他們說是三分之一，我說據計算是百分之七十五，這兩個比率相差很大，中國銀行的計法以對外貿易在香港所取得順差計算，我說不對，因爲中國很多貿易是以貨易貨交易，此外還有無形收入和投資。最後我們統一的意見是，中國在香港取得的外匯收入是佔百分之七十五。

設計這方案時是要考慮各種各樣的因素。收回香港主權後可能會有很嚴重的影響，香港會不會亂？

這些問題提出來之後，鄧小平很感興趣，叫我們將所有可能在香港發生的最嚴重的情況列出來，我們指出，最嚴重的情況是整個中國的外匯收入減少三分之二至二分之一。當時中國只有很少外匯儲備，都來自香港。

鄧小平問還有甚麼，我說可能天下大亂，香港人反對中國收回香港主權，外國力量又插手搞一下。

鄧小平的結論是，收回香港主權，小亂不可避免，中亂很有可能，要盡可能防止出現大亂。

五人小組按照鄧小平的指示，於三個月限期，即一九八二年四月完成了關於收回香港主權具體方案的報告。

「五十年不變」穩定人心

方案中有十二條，即現時中英聯合聲明附件一。其中有一條是中央領導人包括中共中央兩次會議沒有講過的，就是現時大家所知道的「五十年不變」。

其實我們起草這方案的過程中，一直有一個問題，就是香港人對共產黨沒有信心，擔心不知甚麼時候政策會變。起草這方案的第一稿是我寫的，寫了十二條以後，我想，香港人不相信，怎麼辦?於是我加了一條：「以上十二條，在九七之後保證××年不變。」

小組討論時，我解釋這一條是用來起穩定人心的作用。

接着是討論保持多久不變，有人說三十年，有人說五十年。而這「三十年」和「五十年」的數字是根據當時香港報章一些政論而提出來的。當時有言論提出要給英國人維持統治三十年、五十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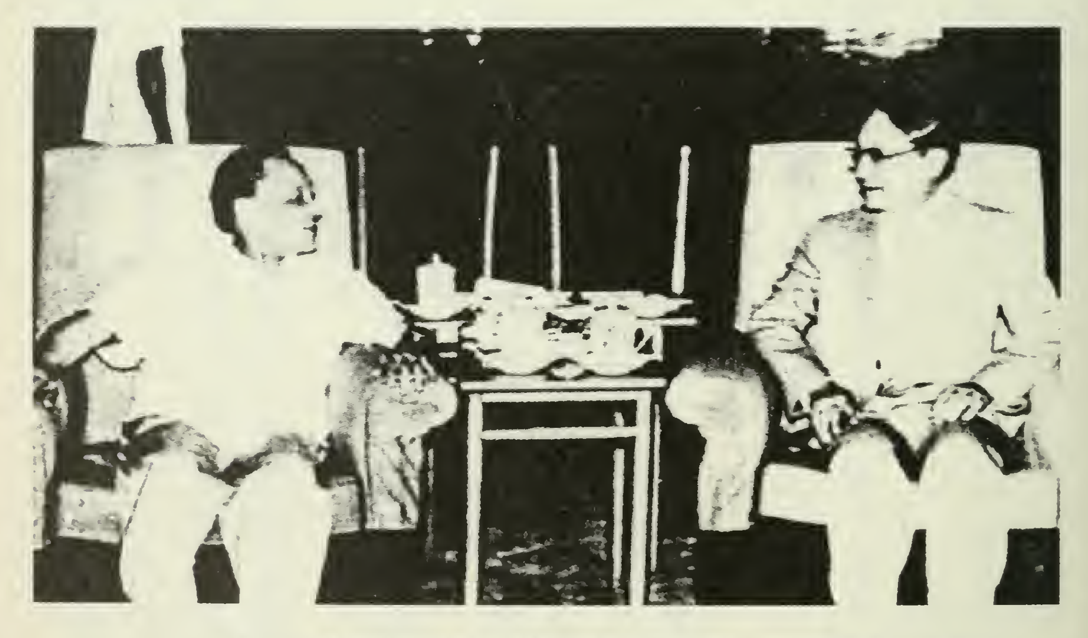
有人說，三十年也夠了，因當時八二年距離九七還有十六年，加起來是四十六年，大家也不知道到時候世界變成怎樣，中國變成怎樣，香港變成怎樣。

後來把草稿拿去給廖承志看，(習慣上是起草完文件後打印出來，每人一份，然後去見領導人，逐句讀出來，如有問題就解釋)，讀到這一條時，廖承志問爲何「爆」出這一條，我就解釋是



在八十年代中國研究收回香港主權政策期間，前任香港大學校長黃麗松博士是香港各界人士中反應最正面的其中一位。

圖爲廖承志於一九八〇年九月在北京會見當時的香港大學校長黃麗松。(新華社照片)



一九八一年，鄧小平會見《明報》創辦人查良鏞(金庸)。(明報資料室照片)

因爲香港人缺乏信心，所以用這一條來安定人心。廖承志聽後說，既然是這樣，又何必要三十年，就俾夠五十年吧！

然後去向鄧小平解釋，爲何加多這一條。鄧小平也同意。

(至於後來有人說是鄧小平早預到中國有三個經濟騰飛，因此要寫上五十年不變，這並不確實。)

一九八二年五人小組提交報告後，鄧小平批示「擬原則同意。方案待與各方面人士交換意見後，再作修改。」

一九八二年三月二十一日至六月二日，鄧小平親自會見十二批香港各界人士。原來的安排是由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三位領導人分別接見，但鄧小平要親自見。其中鄧小平對當時的《明報》社長查良鏞、香港大學校長黃麗松博士和中大校長馬臨博士，講述得最完整。

黃麗松博士聽鄧小平講完以後表示，他到北京之前，不知道中國收回香港主權的態度是這樣堅決，現在知道以後，認爲中國的政策不失爲最好的政策。

黃麗松博士這番話，是我當時聽到香港人最實事求是的反應。其實當時香港人的思維與北京人的思維完全不一樣，有很多負面意見。他們去北京時抱着的態度是：我聽你們怎樣說，然後我要表達不贊成中國收回香港的意見，但他們到北京之後，發覺原來鄧小平與他們會面時並非聽他們表達應否收回主權的意見，而是聽他們講述收回主權後應採取甚麼政策。

鄧小平一開始就講清楚，九七年收回香港主權是不容改變的，一切文章都要在九七收回香港主權這前提下做。

即使在鄧小平接見了香港十二批人士、所有政策都訂了以後，同一年還有三十幾個各界代表團自發訪京，表達意見和憂慮。這些代表團包括左派和中間派，他們都是想游說中國重新考慮九七年收回香港的問題，但當時中央的決策已定下來。

鄧小平接見十二批人士的最後一批，是港區的全國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共十二人。本來鄧小平表示他不見了，他要講的話都講過了，餘下的由廖承志去談，但我們說，您跟李嘉誠和馮景禧等大地產商都已見過面，唯獨人大代表與政協委員不親自見，這樣我們在香港的工作很難做了。但他仍表示不再講。

我們知道，鄧小平與周恩來的作風不同。安排周恩來會客，他說見一小時，結果會談四、五小時以上，他有七成時間是聽客人講話。但鄧小平的習慣是很準時，一小時就是一小時，因鄧小平會客時自己要講九成話。

我們安排鄧小平於早上十時在人民大會堂大廳拍合照後離開，由廖承志談。拍照後，費彝民伸手跟鄧小平握手道謝，但他不握，逕自走到中間的座位坐下來，大家也隨而就座，結果那天他講了兩小時話。鄧小平對座中的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說：「我對收回香港主權有一個問題始終未能解決，中國收回香港主權有一個前提，就是必須取得英國人的合作，假如英國人不合作，那怎麼辦？

「我們的方案中有一條是說要充分照顧英國人的利益，換取英國人和平有秩序地交出政權，我們這個政策是有誠意的，但如果英國人不合作怎麼辦？我想來想去覺得只有一個辦法，就是跟英國人說：假如你們不合作，我們就提前出兵收回香港，收回以後對香港仍實行特殊政策。」

很多關於鄧小平說出兵收回香港的論調，就是這個背景，他的前提是：如果中國充分照顧英國的利益，而英國仍不合作的話，必要時中國會提前收回香港。如果英國人合作，願意交回主權出來，這個問題當然就不存在。

一切條件具備了，就準備迎接當時的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訪華。

戴卓爾夫人訪華前，英國人做了幾件事：

一、上文提過的麥理浩約見王匡，最後挽救中國是否可以改變收回香港的政策。

二、在香港發動輿論，用各種辦法勸中國不要收回香港主權。

三、戴卓爾夫人更改訪華行程。戴卓爾夫人訪華行程原在八一年初已定下來 ，當時她提出的議程，第一是中英關係、第二是中英兩國在國際問題上的看法和觀點、第三才是香港問題；但後來她改了議程，第一是談香港問題。

四、英國前任掌璽大臣向香港的一位中國人員提出，希望此人把他的話轉給北京：英國願意採取在香港共管的形式，港九新界主權屬中國政府，中國政府做這公司的董事長，再聘請英國人做董事總經理。但中國政府對英國這個提法堅決拒絕。



一九八二年九月廿四日，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會見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新華社照片）

一九八二年九月戴卓爾夫人訪華，她與當時的中國總理趙紫陽會面時，趙紫陽一開始就講，香港問題是由鄧小平跟她談的。其後鄧小平見戴卓爾夫人時明確表示，主權問題不可以談判，只談九七年中國收回香港主權時中國採取的政策，並希望英國方面能合作，否則，中國在收回香港的方式與時間上，會另作考慮。

戴卓爾夫人聽了鄧小平這番話後是有些驚愕，但並非如一些言論說，她是因爲聽到這句話，所以走出人民大會堂時才會跌了一跤，她實際上心中早已明白中國的態度。

但戴卓爾夫人在會談之後仍對外強調，英國是根據三個條約管治香港，三個條約仍然有效。接着，戴卓爾夫人從北京來香港。

香港人對中國收回香港主權是有很多矛盾情緒，但身爲中國人卻講不出不贊成中國收回香港主權的話。年青一代的思維就比較簡單而率直。

實際上，中國收回香港主權的整個決策過程，自一九七九年英國人提出香港的主權問題起，一直到一九八一年這三年內，中國考慮這問題是一個相當痛苦的過程，鄧小平在這三年內，也未敢作出決策。影響這決策的核心問題是，收回香港主權容易，但保持香港的安定繁榮就非常困難，當時中國無論在經濟力量或政治的鞏固程度上都存在非常嚴重的危機，而香港人對中國無信心。

港人至今對中國收回香港主權仍有矛盾心態，身爲中國人只能贊成中國收回香港主權，因爲歷史上清楚記載，英國人是通過鴉片戰爭而佔領香港，但香港人最擔心的是，中國收回香港後，原來



早期的中英談判會議，圖爲一九八三年七月，英方(左)：歐威廉、麥若彬、尤德、柯利達、鄭仰平（傳譯）、畢瑞博、史堂穆；中方(右)：羅家驩、魯平、李菊生、姚廣、張幼雲、邵天任、柯在鑠。(明報資料室照片)



中方代表團團長姚廣（右）與英方團長柯利達爵士。（合衆社照片）

習慣的、喜愛的生活方式會否改變，至今仍存在這問題，在當年這信心危機是很嚴重的，我們也作了最壞打算。

第二章　北京對香港實行「一國兩制」政策的構思與爭論



一九八五年七月一日，基本法草委會第一次會議在北京舉行，爲落實一國兩制寫下法理基礎。（中新社照片）

一九八一年初廖承志與港澳辦和新華社香港分社負責人一齊開會，研究收回香港主權時如何保持香港的安定繁榮，不會使香港成爲中國的包袱，坦白說，這是當時最大的考慮。

廖承志與港澳辦和新華社官員開會後向中央提交報告，內容包括：

㈠建議中共中央於九七年七月一日收回香港主權，提出的初步設想是：收回香港主權後，使香港成爲中央直接管轄的一個特區，除了涉及國家主權的必須改變外，其餘不作改變。

㈡容許資本主義繼續存在，保持自由港政策，歡迎各國來香港投資，保障私人投資者的利益，特區財政獨立，港幣繼續流通。

九七後港幣繼續流通，在當時是很受重視的問題，因爲，從五十年代開始到八十年代初期，中國在香港所取得的外匯，佔中國外匯總數平均百分之七十以上。如收回香港主權後，港幣不能與國際貨幣兌換，港幣就會成爲了人民幣。因此，九七後港幣自由兌換、繼續流通，成爲當時研究的核心問題。當時考慮的出發點是不要使香港成爲中國的包袱。

㈢九七年收回香港後，基本上要維持原有的體制和機制、法例和措施，公務員包括警察繼續留用。

實際上當時提出的這個報告，概括的基本精神是盡可能不要變化。在此期間，廖承志曾多次與很多人講，收回香港主權，是換個港督、換支旗。後來才具體化爲中英聯合聲明附件一的十二條，這是經過一個很長時間的醞釀和發展過程。

一九八一年四月，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提出討論香港問題，到一九八一年十二月正式拍板。廖承志在會上簡述收回香港後的政策。然後，一九八二年一月在北京成立政策研究小組，起草收回香港主權後的具體政策和可行性研究，同年三月完成報告，訂出了十二條。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廖承志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解釋收回香港的政策，是沒有稿的。當一九八二年一月在北京起草香港政策，我問他要講稿來看，他掏出了兩張案頭日曆紙，紙上是用鉛筆寫了十二條。

一國兩制目標是台灣

事實上，中國的決策過程，是一個逐步完善的過程。我們在起草過程中，對十二條的內容也有很多爭論。

關於中國收回香港的政策，是從對台政策中構思出來，鄧小平曾經很清楚地說，一國兩制的構想，最初不是為香港提出，而是從對台政策中提出，不過首先是用於香港。在此期間，北京領導人首先考慮的並非香港，而是台灣。

一九七九年元旦，北京以全國人大常委會名義發表了告台灣同胞書。八〇年元旦，鄧小平提出

中國八十年代三大任務，其中一個任務就是統一台灣，那時完全沒有涉及香港。

當時廖承志正在起草對台具體政策。「葉九條」是廖承志主導起草出來的，廖承志當時是中共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的常務副組長，組長是鄧穎超，(我們通常最早期叫「鄧鄧廖」，鄧小平、鄧穎超和廖承志；廖承志逝世後，接替廖承志的是楊尙昆，叫「鄧鄧楊」；直到江澤民擔任對台工作領導小組組長時，才取消了前面的鄧字。)而具體實際起草對台政策的是廖承志。他構思統一台灣實行甚麼政策以及收回香港後實行甚麼政策，心中已形成了一些原則；因此，他敢於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沒有底稿就去講香港政策的原則。

因此，香港政策實際上是從對台政策中衍生出來。一九八一年九月三十日，北京以葉劍英名義發表「葉九條」對台政策。

在整個過程中，對台政策啓發了香港政策，中國對香港的政策，很大程度上是移植了原來構想的對台政策。

而「一個國家兩種制度」這樣完整的概念，是在所有政策擬定出來後概括而成的。雖然這種思想在鄧小平心中早已存在。



廖承志的父親廖仲愷曾跟隨孫中山從事革命工作。圖爲廖仲愷(左二)、何香凝(右二)與同盟會會員合攝　(新華社照片)

廖承志草擬鄧小平拍板

香港政策和對台政策的具體構思和草擬者都是廖承志，最高拍板人是鄧小平。收回香港的決策，其實是他兩人的共同產物。

廖承志從抗日戰爭時就已領導香港工作，長達四十多年。他是中國歷史上很特殊的產物，廖承志之後不可能再有一個廖承志。他的父親廖仲愷是孫中山的左右手，與國民黨有非常密切的關係。廖承志正式寫給中央的審查報告中提及，不計朋友、部下，光是他在香港的親屬就有四百多人。香港任何一個最大家族也沒有這麼多親屬，因此廖承志很了解香港問題，四面八方都可以聽到許多意見。他對香港的情況非常熟悉，然後才能構思出「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特殊政策。

其實，眞正偉大的決策是「港人治港」，這是高度信任香港人的表現，在共產黨體制中這是非常重要的決策。

「一國兩制」的出發點是要保持香港安定繁榮，保持香港繼續爲中國所用，不可以成爲中國的包袱。

「一國兩制」的基本精神是，收回香港主權後，香港繼續維持資本主義制度，最核心的理由、最主要的考慮，是中國有這個需要。



一九八六年一月，當時的中國國務院港澳辦秘書長暨基本法草委會副秘書長魯平率法律專家工作小組訪港，聽取香港各界的意見。

圖中人包括魯平(右四)、邵天任(右七)、蕭蔚雲(左三)、吳建璠(右六)、許崇德(右五)、徐澤(右一)等。(明報資料室照片)



一九八六年一月魯平所率領的專家小組與大專院校的學者會面，聽取對基本法的意見。(明報資料室照片)

中國從來都很重視香港對中國的特殊作用，從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香港能為中國提供經濟上外匯的利益逾七成，最高的時候超過八成半，這是經濟利益。

第一是錢第二是錢第三是錢

廖承志六十年代對新華社官員談到香港的作用時就說：你們在香港工作，第一是錢，第二是錢，第三是錢。

另一方面，香港是中國對外的渠道，早在五十年代，一九五八年，周恩來概括了香港的特殊作用，他說，香港是天文台、觀察站，氣象台、發射站，香港適宜發出放射性的東西。香港是世界三大情報中心——紐約、日內瓦和香港——之一，中國很多工作是透過香港進行的。中國了解和觀察西方世界，最大渠道是通過香港。在新華社香港分社二十二層樓當中，光是替中央核心機關採購西方報紙，就佔了一層樓。

周總理又說，香港是個適宜發射放射性東西的地方。

中國收回香港後，仍然很需要一個與西方社會有密切聯繫的、資本主義的香港，繼續為中國所用。因此，中國要香港在九七年後繼續實行資本主義制度，最核心的理由就是中國有這樣的需要。



周恩來在五十年代概括香港的特殊作用時曾形容香港是天文台、氣象台與發射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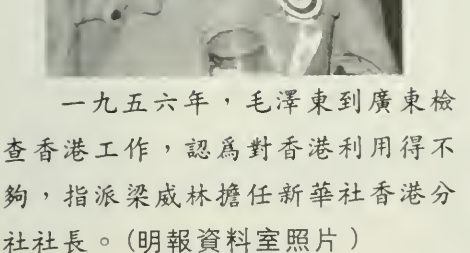
圖為周恩來鄧穎超一九七〇年合攝於北京　（新華社照片）

如果收回香港主權後，香港變成上海、廣州、天津一樣，那麼，香港就會成爲中國的包袱。

從一九五八年起，我們在香港工作的基本方針非常明確，就是「長期打算，充分利用」這八個字。一九五六年，毛澤東到廣州檢查香港工作，他很不滿意，認爲對香港利用不夠，因此，新華社進行了一次大改組，派梁威林來港主持新華社工作。當時毛澤東檢查香港工作很具體，他說，《華僑日報》和《星島日報》這兩份報章可以銷往台灣，因此要通過這兩份報章，將大陸的訊息傳達到台灣，但千萬不要改變《星島日報》和《華僑日報》這兩份報紙反共面目，要保留中華民國年號、保留反共，在最關鍵的時候傳達幾句話就夠了。

一九五八年，周總理概括香港工作的指導思想是：「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當時想的「長期打算」，是長期在英國人手上。當決定收回香港主權時就討論，將來收回香港主權後，是長期保持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歸根究底這是中國有此需要。

第二個考慮是對香港人讓步。八十年代文革剛結束，很多冤假錯案揭發出來。香港人不願接受中國大陸的社會主義制度，因此當時要提出香港人可以接受的政策，制訂實事求是、符合香港人願望的政策。九七後容許香港實行資本主義制度，是對香港人讓步。



一九五六年，毛澤東到廣東檢查香港工作，認爲對香港利用得不夠，指派梁威林擔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明報資料室照片)

而中國制訂的「一國兩制」政策，只容許在三個地方實施，就是香港、澳門和台灣。至於西藏、新疆和蒙古，甚至將來的廣東，也不可以，因此，中國不怕。

「一國兩制」的思想模式適用於台灣，即「你搞你的一套，我搞我的一套」、「你不吃掉我，我不吃掉你」。這個思維是適合台灣的。但中國收回香港主權的模式卻不能完全適合於台灣。因為香港是英國人交出主權，而台灣並沒有交出主權的問題；香港沒有一個中央政府，而台灣卻有一個中央政府，縱然中國大陸不承認，但台灣的中央政府確是存在。因此收回香港主權的模式難以在台灣實現，至少是現在看不到有這個可能性。

中國不能實施聯邦制

基於上述的原因，台灣內部很早就有人提出是否應實行邦聯制或是聯邦制，以解決台灣問題。

一九七九年，台灣一位原籍四川的政治人物，到大陸奔父喪，被邀請到北京，由我陪他同行，他原先講明這次大陸之行不談政治。

當抵達北京後，一位有權勢、亦是四川人的部長請我們吃飯。席間，這位部長對台灣政治人物說：「你是四川人，我也是四川人，共產黨自四九年掌握政權

之後，四川一直未有搞好，同四九年之前差不了太多，我覺得很慚愧。」

台灣政治人物受到對方的熱誠感動，他從未聽過共產黨中央級數的部長如此直言慚愧，故此漸漸將話題扯到政治上去。

那位有權勢的部長表現得很謙虛，向台灣政治人物請教：「現在兩岸緊密封鎖下，要實現中國統一，應該如何邁出第一步？」

台灣政治人物說：「我認為，只有走從邦聯制到聯邦制再到統一這條路。」

那位部長聽了覺得很有啓發，希望對方能說得「豐富點」，反映出他當時肯定了這個思維，並且安排了第二次會晤再詳細討論。

但在既定會晤日子的前一晚，這位部長通知取消會晤。他並要我向台灣朋友轉告一句話：「聯邦制不是我們的政策。」但沒有講理由。

為甚麼聯邦制不能作為中國的政策？

解決台灣問題，很明確地擺出了一個事實：北京的中央政府和台灣的地方政府統一，最少現時幾乎是一件很艱難的事，但如果是較鬆散的邦聯，台灣是可以接受，聯邦制也是可以接受的。

但另一方面，中國有個實際問題。中國是個多民族國家，有它獨特的形成歷史。

台灣是從未獨立過的，但是西藏則曾經是個獨立而強大的吐蕃，連唐太宗也怕了他，要將妹妹下嫁和番；新疆以前是匈奴人的根據地，在新疆建立過十多個國家；還有蒙古，它曾經是個強大帝

國，聲威遠播。如果北京對台灣實施聯邦制，那麼，西藏、新疆、蒙古以至香港又如何？恐怕未統一台灣，中國先已四分五裂。

從這點可以解釋，爲甚麼香港實行「一國兩制」的模式，是要成立特別行政區。這是迴避了聯邦制的影響。

基於上述的原因，中央對香港的政策是容許「高度自治」，但不是聯邦制。

有人懷疑「一國兩制」是否眞能五十年不變？是否中國長遠的戰略決策？

香港對中國戰略價值增加

其實，任何長遠戰略決策都不能沒有休止，只要條件變化，它便會變化。中國改革開放之後，對香港的利用，和香港對中國的戰略價值並沒有減少，反而是增加了，香港始終是中國進入西方世界的橋樑和通道，也是西方世界進入中國市場的橋樑和通道，香港正是在橋樑和通道的過程中壯大，香港是不能離開這個橋樑角色去自己搞完整的經濟體系，這是沒有可能，必須通過這個橋樑的角色去提高自己的地位。如果這個作用沒有了，情況便會出現變化，但在預見的將來，中國沒有任何城市可以取代香港的戰略地位。即使國內城市譬如上海可以發揮這樣的作用，甚至超過香港的作

用，都不等如香港便沒有作用了，只是作用大和小的分別，當然，現在的作用比任何地方都要大。

如果中國將來四通八達，與西方國家有更密切的聯繫，香港不再是唯一、獨特或特別重要的聯繫渠道，成爲與上海或其他城市的一般聯繫渠道，到此時候，「一國兩制」中的「兩制」，已經有許多事在調和中。到這個年代，香港人也就不會如現在那樣緊張了。

對香港特殊政策的最大發明，其實是「港人治港」。

港人治港，是中央充份信任香港人可以自己管理好香港。這對共產黨來說，是很大膽很大膽的思維，如果提出「港人治港」的領導人沒有一個非常偉大的膽略，是提不出這個思維的。

首先作出這大膽構思的人就是廖承志。

一九八一年，廖承志就「港人治港」的構思徵求許多香港人的意見，但大多數的人都反對，因他們認爲當時整個香港的權力是操在英國人手上，香港人根本不了解香港的政權運作。當時的香港人只是參與較低級的公務員行列，至於行政和立法局議員只是唯唯諾諾的應聲蟲，香港人沒有精英參與政府高層架構，因而懷疑香港人能否眞能管治好香港。

廖承志當時曾邀請了財政司裏最高級的華人第三把手上北京商談，交流意見。這位財政司的第三把手不諱言並不知道英國人在香港有甚麼佈置。就以外匯基金爲例，只有港督、布政司、財政司和財政司裏的第二把手共四人知道如何處理，連他本人也諱莫如深。

一九六八年之前，香港所有的外匯基金一直是以英鎊存放在英國的銀行，香港政府沒有任何權



位於皇后大道東的新華社香港分社大樓外貌。大樓的其中一層是專門爲國內各中央機關採購外國報刊，收集西方世界資訊。(明報資料室照片)

力可以將它調走。一九六八年，英鎊發生嚴重危機，英鎊兌港元由十四比一，一直下降至七比一，香港整個外匯儲備損失了三分之一，當時的香港人，甚至許多公務員也不知道這件事。

廖承志當年談及「港人治港」時，認為先要解決港人對自己的信心，他對來訪者說：中央都對香港人有信心，為甚麼香港人反而對自己沒有信心？

不能由大陸人管香港

提出「港人治港」的根本依據是：既然香港繼續實行資本主義，由國內派人去管香港，肯定管不好。中國官員由上到下都是共產黨員，共產黨員是反對資本主義的，又怎能去維護資本主義？因此，當時第一個決定的原則是不能由大陸派人去管香港，香港只能由香港人去管，而且不能干預。因而就有高度自治的提法。起草方案時，甚至認為，如果這個方案失敗，就會是失敗在大陸的干預上。因此，「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這八個字是相連的，沒有「高度自治」，實際也就沒有「港人治港」。

但是，對這些政策的內涵，在共產黨內部也是有爭論的。比如：

九七之後香港實行資本主義制度，應該包括些甚麼內容？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十八日，基本法諮詢委員會成立，爲基本法的草擬徵求港人意見。圖爲諮委會主任安子介在成立大會致詞，旁爲草委會主任姬鵬飛（右三）、草委會副主任包玉剛爵士（右二）等。(明報資料室照片)



基本法諮委會共有一百八十名委員，來自香港各行業。圖爲諮委會成立大會全景。(明報資料室照片)

有人認爲九七後實行的資本主義制度主要是經濟制度。維持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這當然沒有爭議，但是是否只局限於經濟制度？另一種意見，是強調要維持完全的資本主義制度，也就是說要包括經濟制度、政治制度和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如果只保存經濟制度是資本主義，政治制度不是資本主義，就一定行不通；如果只保持香港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不同時保持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把國內的意識形態強加於香港人，「一國兩制」的基本構想也就會受到根本性的損害。

這些問題在共產黨內部一直爭論得很激烈。

最近，江澤民多次召集地方省委書記，向他們強調，九七收回香港主權絕不能如四九年般搞「大軍南下」，囑他們不要準備在香港撈甚麼油水。但是，搞思想上的「大軍南下」是個很值得注意的問題。有些人總覺得香港的資本主義思想不好，要加以改造，要對香港人「洗腦」。現時左派報紙的許多文章，都清晰反映了這種思維。九七之後，這兩種意識形態的關係或會變得相當尖銳。

「一國兩制」之中，「兩制」之間是否有矛盾？也是共產黨內部爭論得很激烈的題目。一種意見認爲是肯定的，「兩制」怎會沒有矛盾？在共產黨理論中，資本主義制度和社會主義制度是「你死我活」的鬥爭，不可調和。

但另一種意見是認爲絕對沒有矛盾，他們認爲香港利益和中國利益是一致的、香港人的利益和中國人的利益也是一致的。



當年，基本法諮委會經常舉辦各種專題的研討會徵詢各界意見，圖爲諮委會副秘書長邵善波(中)、諮委歐成威(右一，已故)，林邦莊(右二)、林光宇(左一)和學者劉兆佳。(明報資料室照片)



諮委之一謝志偉博士在會議後對新聞界覆述情況。(明報資料室照片)



基本法諮委會執委合影。(C. F. Lam 攝)



基本法諮委會秘書處職員合照留念。(C. F. Lam 攝)

後者的想法完全違背共產黨的哲學思想。共產黨的理論是：矛盾存在於一切事物之中，矛盾是存在一切事物的始和終。只有以下的區別：有些矛盾是有對抗性、有些矛盾是沒有對抗性。毛澤東將這些對抗性和非對抗性分為有些矛盾是人民內部矛盾、有些矛盾是敵我矛盾。而沒有一樣事物是沒有矛盾的。

因為反對「兩制」之間有矛盾，就把許多現象解釋為帝國主義陰謀。不久前的人大會議，仍有中國官員談到英國人撤走之後，要保留甚麼力量？強調英國是要留下一個「沒有英國人的英國政府」。按照這種思維，豈不是把將來特區政府的公務員，看成是「英國的走狗」？

另外一種意見認為兩制之間是存有矛盾的，只是這種矛盾本身不帶對抗性質，因為中國和香港的根本利益一致。但不能否定它們之間有矛盾。從這個思維就引伸出另外一種政策。

中方與民主派可化敵為友

譬如民主派是否敵人？民主黨是否敵人？如果能有適當政策，民主派、民主黨仍是我們的朋友；若果是不適當的政策，他們便變成敵人。按照錢其琛所說，中方和民主派的矛盾，是在民主的

道路和發展速度上有不同意見，這就是非對抗性矛盾，整個民主派便是我們的朋友。如果說這是帝國主義的陰謀、是帝國主義的代言人，則整個民主派便是我們的敵人。

不同的觀點產生不同的政策。正確的政策應該是：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化消極因素爲積極因素。連黑社會的消極因素也可以化爲積極因素，何況是一大堆博士和大律師的民主派，爲甚麼不能把他們團結過來？

關於「一國兩制」的理論性問題，香港人沒有怎樣研究，但其實，這些理論性問題有很多內容，是指導今後的政策發展。對理論的不同理解，會引申出將來很多不同政策，而這些政策是帶有根本性。不好好地解決，就不能眞正貫徹「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例如「六四」以後，北京實際上在許多解釋層面上是對香港收緊了。大家都知道，「六四」之後，北京提出了「顚覆基地」問題。中國以往並沒有視香港爲「顚覆基地」，只有認爲是美國利用香港作爲收集情報的基地、台灣利用香港、國民黨利用香港作爲破壞中國的基地。但從來沒有一種概念認爲香港本身會是「顚覆基地」。說香港是「顚覆基地」，豈不是說香港人要顚覆中國？「六四」之後有一段時期，解釋「顚覆基地」很含混，導致對香港人有不正確的看法，而「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政策，正是需要建立在充份信任香港人的基礎上，強調「顚覆基地」問題正與其相反。

收回香港主權後，如何處理香港和大陸之間的關係？還是江澤民說的對：「井水不犯河水」。



（新華社照片）

港人治港
一國兩制
保持繁榮穩定

江澤民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十九日

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說的「井水不犯河水」，其實正含有一國兩制的精神。圖為江澤民的題字。

當時有人提出，江澤民只說井水不犯河水，沒有說過河水不犯井水，即香港不可以干預大陸，但大陸可以干預香港。這些人根本是不通中國文化，井水不犯河水，本來就包括了河水不犯井水的意思。本來這句話很合理，江澤民是給了香港人一件武器。但當時許多香港人在民主派的喧嘩下，不理解江澤民的說話，沒有將武器接過來。

九七之後，香港人應該眞正研究「一國兩制」的理論，將理論衍化為一種實際的政策，這是香港人維護香港和香港人利益的一個重要工作。如果香港人自己也不研究，也就只有由一些八股、教條的理論主導香港，港人的利益就會受損。香港有這麼多的大學，很難理解為甚麼沒有一家大學開設研究「一國兩制」理論的課程，沒有研究「一國兩制」的博士論文出現。

第三章　中英談判和過渡時期的爭論



香港記者窮追不捨的精神，讓世人得知中英會談的進展。圖爲一九八四年二月在北京台基廠頭條三號賓館舉行中英會談的場景。(明報資料室照片)

在現代史上，中英政府通過談判解決香港主權的移交是世界上一個典範。英國佔領了香港一百五十年，通過中英兩國政府的和平談判，順利解決了這樣一個重大的國際爭議，而又能在十三年的過渡時期裏平穩過渡，是中英兩國政府共同努力的成果。

雖然在十三年過渡期中，中英兩國政府之間無可避免有很多爭論，但最後都能得到妥善的解決。香港問題的解決，說明了中國與英國政府是有誠意通過和平談判的方式妥善解決香港問題的。因此，儘管中英之間有很多爭拗，但兩國的合作是主要的。

有一種觀點認爲，在解決香港問題的過程中，中英的爭拗是主要的，我不同意。雖然在整個過程中充滿了不同的意見和爭論，但總體來說仍是合作的；如果不合作，根本就不可能得到今天的解決成果。

因此，我覺得英國最近提出要光榮撤退，中國政府應給予英國一個光榮撤退的機會，這樣可以表示對中英政府在香港問題上合作態度的肯定，也有利於香港的平穩過渡。

中英之間的談判實際上是由鄧小平與戴卓爾夫人的談判開始。

一九八二年九月戴卓爾夫人訪華。訪問之前，戴卓爾夫人將訪問行程的議程突然更改。一九八一年，中英兩國協商戴卓爾夫人訪華的議程時，本來香港問題是擺在第三位，第一位是中英關係，第二位是中英在國際問題上的觀點，最後才談香港問題。但一九八二年初，英國政府提出，要將香港問題擺在戴卓爾夫人訪華議程的第一位。事實上，在一九八二年初的時候，香港問題已顯得相

當突出，而中國也已作出最後決定，在九七年時要收回香港主權。

戴卓爾夫人訪京時，先與當時的中國總理趙紫陽會面，趙紫陽指出，關於香港問題是由鄧小平跟她談。戴卓爾夫人與鄧小平的談判，是兩個鐵人的談判，鄧小平是中國的鐵人，解決問題很有魄力，而戴卓爾夫人在國際上也有「鐵娘子」之稱，處事方式很堅決。

會談前，鄧小平在會議廳等候戴卓爾夫人時對工作人員說：「香港不是福島，中國不是阿根廷。」當時英國正打完福島之戰，很威風。

兩人見面後，先由戴卓爾夫人闡明英國的觀點。她說：香港在英國管治下取得很大成就，因此，如果英國對香港的統治發生變化，香港就會出現災難性的結果。鄧小平則明確告訴戴卓爾夫人：主權問題不可以談判，中國決定在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這個問題沒有談判餘地。

鄧小平對戴卓爾夫人說，中國承認英國管治香港取得的成就，但是，他不相信像戴卓爾夫人所說的，香港沒有英國的管治，就會出現災難性的後果。鄧小平說，如果眞的出現這樣災難性的後果，就讓它來吧！「中國政府要勇敢地面對這個災難，做出決策。」

鄧小平態度堅決

鄧小平的態度非常堅決，而當時戴卓爾夫人與整個英國政府仍然很有幻想，不相信中國收回香港會如此堅決。戴卓爾夫人反反複複地申述英國的觀點，不希望九七年香港政權會出現改變。

鄧小平對戴卓爾夫人表示：中國期望英國能跟中國合作。如果英國不肯與中國合作，製造「人爲混亂」；「如果在十五年的過渡時期內，香港發生嚴重的波動」，那時中國政府將被逼不得不對收回的時間和方式另作考慮。

這裏所說的「時間」是指不一定等到九七年，「方式」是指不一定是「和平」的方式。

會談後，戴卓爾夫人步出人民大會堂時跌了一跤，傳媒渲染說是戴卓爾夫人聽了鄧小平的話後驚嚇所致。我相信並非事實，戴卓爾夫人身經百戰，有政治上的宏量，不會因爲鄧小平講一句話就會這樣。那是傳媒對戴卓爾夫人的「抹黑」。

一九八二年初，我們在北京安排鄧小平見十二批香港人，最後一批是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與政協委員。本來鄧小平最初表示他已談了許多，這次他不談了，由廖承志去談，但鄧小平在拍照後卻自行到會議廳中間坐下來，而且一談就談了兩個小時。鄧小平說，現在對香港的政策已定下來了，我

們用充分照顧英國人的利益，換取英國人和平而有秩序地將香港的主權交回。大前題是英國人合作，但是如果英國人不合作，我們怎麼辦？這個問題我想了幾個晚上，如果英國不合作，香港出現大混亂，中國就只能提前出兵收回香港，收回後還是採取既定的特殊政策。沒有這一條，制服不了英國人。

與英方談判有兩手準備

在鄧小平主導中英談判中，始終是作兩手準備，一手是在充分照顧英國人利益下，用合情合理的政策，解決主權移交問題；另一手是，不管英國是否接受，中國也要收回香港，必要時提前出兵收回。

其後鄧小平會見鍾士元、鄧蓮如和利國偉三人時又說，無論香港人是否理解，中國也要收回香港主權。

鄧小平與戴卓爾夫人會談後，實際上中英就香港問題的談判已經展開。

當時傳媒報導中英會談都只知道有第二輪第幾回合的談判，其實，既有第二輪，自然就應有第

一輪。中英會談的第一輪是由一九八二年十月初到一九八三年三月上旬，共談了五次，中國方面的代表是當時的中國外交部副部長章文晉，直至他出任駐美大使；英國的談判代表是英國駐華大使柯利達。

這五次磋商結果連議程問題也未談好。當時香港處於經濟危機時代。在世界經濟危機中，香港的經濟波動很大，股票市場由一千一百幾點跌至六百幾點，地產市道跌了五成，香港兌美元從四點五比一跌到九點一比一。整個香港經濟處於很艱難的局面。

當時英國提出，根據中英兩國元首戴卓爾夫人和趙紫陽達成的協議，中英兩國共同維持香港的安定繁榮。現在香港經濟上出現這樣危難，雙方應首先談這問題。

但中國的觀點是首先要談主權問題。要英國先明確接受在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將香港主權交還中國。章文晉說，中國政府說中英雙方合作保持香港安定繁榮，是在英國同意九七年主權轉移這個前提下談的。

這樣大家對議程談了五次仍談不攏，第五次時，柯利達說，雙方的材料都已擺在眼前，不如一齊談吧！章文晉說，不錯，材料都已擺出來，但究竟是煮「中餐」還是煮「西餐」，還未確定，廚師又怎麼去煮呢？結果就在章文晉這段話中，結束了中英會談第一輪共五次的磋商。

一九八三年三月十日，戴卓爾夫人寫了一封信給趙紫陽，她表示作爲首相是沒有權力單獨採取行動同意轉移主權的，只有英國議會才有權作出這個決定。她說，在一定情況下，她準備考慮將主

權問題向議會提出建議，只要中英政府之間能就香港的行政管理安排達成協議，而這些安排又能使她信服可以確保香港今後的繁榮安定，並且能爲中國政府、英國議會和香港人所接受，她就會準備向英國議會提出建議，將香港的主權回歸中國。

這封信表達了英國實際上已準備接受九七年將香港主權交還中國，但要有兩個前提：(一)中國對香港的特殊政策安排能保證香港的安定繁榮；(二)中國政府保證香港現行的許多制度不變。若兩國最後達成的協議能得到中國政府、英國議會和香港人所接受，在此前提下，英國會將香港主權轉移的建議提交議會。

戴卓爾夫人這封信導致了中英會談第二輪實質性會談的開始。

一九八三年五月下旬，中英就香港問題第二輪談判展開。

在中英會談過程中，香港傳媒有很大貢獻，因爲原本中英之間的商定，會談地點是不公開的，但香港傳媒採取車釘車的戰術，廿四小時死守英國駐華大使館，每當大使館有車駛出，記者就乘的士尾隨不捨，而且用高價收買的士司機，遇紅燈也照衝，全程跟蹤英國代表，終於發現了中英會談的地點，香港記者重重包圍會談地點，以致中英政府無法再進行保密，這就讓香港和全世界都知道中英談判的進展情況和結果。香港記者在這個問題上作出了重大貢獻。

中英第二輪會談一度停頓

中英第二輪會談可分爲兩個階段，第一至第三回合完全沒有結果，第四第五回合也沒有結果，接着停頓下來，柯利達和尤德返回倫敦匯報。

這個階段，英方代表團始終堅持以主權換治權，但中國不同意。中國堅持，收回香港主權是全部的，而不只是名義上，中國政府收回香港後，會採取特殊政策管理香港。

中英談判在一九八三年八、九月停頓了五十天。後來是兩個人的力量促使談判繼續。第一個人是鄧小平。鄧小平在一九八三年九月十日會見當時到中國訪問的英國前首相希斯，會面時，英國駐華大使館主要官員全部在座。

鄧小平對希斯和英國大使館官員說：想用主權換治權是行不通的，希望英國人不要再糾纏在主權問題上，不要搞成中國單方面發表聲明收回香港，最好是中英兩國政府共同發表聯合聲明，這是對英國有利的。

鄧小平又說，他去年與戴卓爾夫人會談時講過，要在一兩年內宣佈中國收回香港的政策，即是在明年這個時間由中英兩國發表聲明，這樣會比中國單方面宣佈收回香港主權好。



英國前任首相希斯一九八三年九月訪京後攝。
(明報資料室照片)



一九八四年七月三十一日，鄧小平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會見英國外相賀維　(新華社圖片)

這段話實際上表明，中英會談最多只能再談一年，否則，中國就要單方面宣佈收回香港。這次談話，鄧小平非常明確地斷絕了英國的所有幻想。希斯將這個訊息帶回英國。

另一個起作用的人是戴卓爾夫人。

一九八三年十月十四日，英國駐華大使柯利達帶了戴卓爾夫人的口訊給中國領導人，大意是，英方已在談判裏表明，英國的管治是使香港持續穩定繁榮最可靠的基礎，但中方持有不同看法，英方認爲，對抗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只要通過談判達成解決基礎，才能確保香港安定繁榮。因此英方建議，在不影響任何最後協議的情況下，由雙方談判代表討論，想出其他有效辦法維持香港的穩定繁榮，進一步聽取中方的意見，英中雙方能否在中國一起作出對香港持久解決的安排。如果在此基礎上能商訂確保香港穩定繁榮的安排，英國政府準備向議會提出一個寫明這安排的雙邊協定，並將盡最大努力使這安排能實現。

英國曾打民意牌經濟牌

接着中英談判得以恢復。

在一九八三年九、十月之間，香港經濟危機非常嚴重，英國也利用「民意牌」、「經濟牌」來

麼中國。

中國在整個談判過程中對香港經濟一直很關注。從一九八二年十一月開始，中國有一個小組專門研究香港的經濟，八二年十二月，廖承志親自主持了一個中國多個部門參加的會議，研究香港經濟問題，會議的結論是，當時香港的經濟很惡劣，第一個因素是由於世界經濟危機，第二個因素是由於香港政府對經濟的一些部署不很合適，香港經濟處於調整期，第三個因素是九七的信心危機。

這些研究在整個談判期間一直持續。但中國政府對於信心危機在香港經濟嚴重惡化中究竟作用有多大？心中無數。最後是匯豐銀行一個月報幫了忙。該月報分析，當時香港的經濟所以衰退得這樣嚴重，港元下跌那麼多，其中世界經濟危機因素佔了百分之三十幾，香港經濟不協調、不健全，需要調整，佔百分之四十幾，至於受九七信心危機的影響佔百分之十六。換言之，信心危機不是當時香港的經濟問題的主要因素。這個調查非常有助於中國了解香港情況，並對一些政策下決心。

中英會談停頓了五十天，重新回到會議桌後，實際上是談中國在九七後準備實施甚麼政策。就是後來中英聯合聲明附件一的十二條。

至此，中英會談進入另一環節，是具體實質談判的新階段，關於九七年中國收回香港主權的問題已經解決了。



一九八四年六月，鄧小平(左一)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會見鍾士元(左二)、鄧蓮如(右二)和利國偉(右一)　(新華社照片)

在此之前，英國外相賀維到北京訪問，他在香港時已表達了英國不可以再用「以主權換治權」的辦法來解決香港問題，英國現在只有兩個選擇：(一)在有協議的情況下實現香港主權轉移；(二)在無協議下實現香港主權轉移。英國所能爭取的只是在有協議的情況下主權轉移。英國已經承諾在九七年七月一日，把香港政權交還中國。

賀維在香港行政立法兩局議員面前講了類似一番話，引起兩局極大震動，兩局首席議員鄧蓮如、鍾士元擬就了一個兩局備忘錄，先到倫敦，再去北京見鄧小平，結果被鄧小平訓斥一番；但鄧小平並無像香港傳媒所說的，批評鍾士元是「孤臣孽子」，我們翻查任何紀錄都沒有這四個字，不知道香港傳媒是根據甚麼作此報道。

在中英談判中還有些具體爭論的小插曲，例如中方在香港特殊政策中寫明「高度自治」，英方要加多兩個字：「最高度的自治」，中國不同意，因爲如這樣寫無疑是要擺脫中央。

英方又提出要在九七後保持英國與香港的聯繫，中方要求英方澄清這是不是「剩餘主權」。

英方又提出，中國對香港政策的幾個不變，時間是指九七年六月三十日收回之前，中方表示，這些「不變」是應該由中英聯合聲明簽署之後起計算，否則，英國在九七前大變，中國政府如何處理？

像這些問題，中英雙方曾有很多爭拗。坦白說，現時中英聯合聲明附件一的十二條，有些並非中方的底牌。例如，中方原先的構想，九七後香港的主要司級官員和警務署長必須由中國人擔任，



一九八四年九月廿六日，中英兩國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草簽，圖爲雙方代表周南與伊文思代表兩個政府簽字。

（新華社照片）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九日，中英兩國正式簽署聯合聲明，圖爲鄧小平、趙紫陽與戴卓爾夫人舉杯祝賀　（新華社照片）

但不是說全部司級官員，若干非政治性部門，英國人仍可留任。而後來在談判中，討論到司級官員和警務署長須爲中國人時，英方立即就說OK。

英國處處進逼弄巧反拙

實際上，中國當時的設想是很寬鬆的。如果不是英國人一開始就存有幻想，處處進逼中國，而是一開始就充分合作，相信中英聯合聲明內中國對香港的政策，會更加寬鬆。

八二年廖承志曾經提出：九七後，最好由原來的英國籍司級官員留任顧問，最好連港督也留下來當特區政府的顧問。

廖承志還曾說，看來九七以後香港特區的領導人要有點親英色彩，甚至必須是親英人士才行，否則香港不能安定。廖承志還說：抗戰前利銘澤第一次見他時就申明，他是代表英軍情報局來見我的，夠親英了吧！但後來他不是變得很愛國嗎？只要中國強大，就不用理會別人是親英或親美。中國強大了，收回香港主權後，也就自然變得親中。

由此可見，當時北京對香港政策的構思是很寬鬆的。其實，「愛國」的定義在中共黨內也時有不同的爭論，有人認爲，愛國必須是愛社會主義祖國；有人認爲，愛國也須愛黨；但廖承志的觀點



・廖承志說當年親英的利銘澤後來變得很愛國。
圖為廖承志(右)一九七八年十二月會見利銘澤時攝　（美聯社照片）

是認爲：海外中國人愛國，愛的是中國傳統歷史文化的中國，總之中國強大就好。廖承志曾概括形容爲「馬馬虎虎的愛國主義」。

正是這種「馬馬虎虎的愛國主義」最能團結人。例如梅艷芳在六四事件後曾聲言不到中國大陸去，後來華東大水災，香港的明星足球隊到國內義演籌款，梅艷芳終於答允以啦啦隊隊長身份同行。這是香港人的特殊心態。

鄧小平說罵共黨也可以

因此我們當時認爲，不用怕九七後香港人親英，親英才能穩定！

但後來中英談判期間很多爭議，有些心態慢慢變了。

鄧小平一九八四年十月三日接見香港觀禮團時說過，將來管治香港的人，要以愛國人士爲主體，主體就不是全部。鄧說：左派當然要有，盡可能少；主要是中間持平人士；右派人士也可以有一些，罵共產黨的也可以有一些，這樣安排，香港各方面人士才能心情舒暢。

我相信現在香港人心情不是那麼舒暢，就是因爲鄧小平當年這番話未能全部落實。某些人強調，治港的港人都要全部「愛國愛港」。



中英聯合聯絡小組會議，攝於一九八五年十一月的北京釣魚台國賓館，右一為中方首席代表柯在鑠，左一為英方首席代表魏德巍(即後來的港督衛奕信爵士)　(中新社照片)



中英聯合聯絡小組會議，攝於一九九〇年十二月，右方中間為中方首席代表郭豐民，左方中間為英方首席代表戴維斯。(明報資料室照片)

中英談判最後階段糾纏在幾個最核心問題上，就是中國政府提出要設立一個中英聯合聯絡小組，英國方面堅持不同意，認爲這會令九七前香港出現中英共管的現象。最後是鄧小平對賀維明確地說明：(一)中英聯合聯絡小組不會是另一個權力中心，保證中英聯合聯絡小組不會形成共管現象；(二)中英聯合聯絡小組的會議輪流在香港、倫敦、北京三地舉行；(三)中英聯合聯絡小組的期限至二〇〇〇年，即九七年過後三年，英方可在小組提出意見，雙方達成共識，繼續貫徹中英聯合聲明的實施。

這是鄧小平會見英國外相賀維時親自解釋的，這才使中英談判最後達成協議。

在此之前，中英談判還談到關於新界土地批出期限的問題，本來英國人的想法是，批出土地期限超過九七年，補地價的錢給中國政府，中國政府說中國不要，全部留給香港：九七年六月三十日之前的地價給香港政府，七月一日之後的地價，撥歸土地基金，留交特區政府。

中國政府這樣寬鬆的程度，英國方面始料不及。

另一個問題就是駐軍。

駐軍原則不需要討論

駐軍問題其實是有兩個不同的概念，一般人弄不清楚。



特區駐軍(攝於一九九六年一月)。(明報資料室照片)



中國解放軍駐香港部隊副司令員周伯榮少將(右)與駐港英軍司令鄧守仁(左)合攝。(明報資料室照片)

第一個概念是駐軍原則。中國軍隊絕對有權在中國所有領土上駐軍。正如鄧小平所說，駐軍是體現主權。九七年七月一日之後，香港回歸中國，是中國領土一部份，中國當然有權在香港駐軍。這個駐軍原則中國政府從未討論過，因爲不需討論。

第二個概念是駐軍方式，即用甚麼形式在香港駐軍。因爲當時香港人對駐軍問題非常敏感，故此中國內部在初期存有不同的意見，提出過幾種方案。

第一種方案：軍隊主要駐在深圳，香港境內只象徵式駐軍。

第二種方案：解放軍主要駐守在香港，深圳作爲後勤基地。

第三種方案：解放軍不來港，全部留在深圳，有事時再進駐。

對於第三種方案，香港大部份資本家均表反對，因他們擔心香港在主權移交時會有動亂發生，倘出了事之後才由深圳出動解放軍開來香港，會十分麻煩，而且遠水救近火，容易小事化大。

鄧小平在很早期也傾向第三種方案，即解放軍不開來香港。但賀維後來到中國訪問，直接向鄧小平提出，香港人心脆弱，希望中國不要派解放軍駐守香港。

鄧小平聞言大爲光火，認爲英國外交部長怎可以向中國提出駐軍問題？這無疑損害中國主權的原則，因而促使鄧小平改變最早期的傾向，變得堅決地要駐軍香港。一九八四年四月，當時的國防部長耿飈出席人大會議後答香港記者問時說不駐軍，鄧小平在接見港區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時即大罵「胡說八道」。

鄧小平早期的傾向是指駐軍方式，而不是駐軍原則。現在駐軍香港已成定局。根據傳媒的報道，將有數千解放軍駐守香港，其數目可能相當於英軍駐港人數。但據我所知，未來駐港解放軍人數會很少，肯定會是象徵式駐軍。

談判架構有三個層次

還有一件事，大家可能也不太清楚，就是中英談判的架構。衆所週知，中英雙方是各有一個談判代表團。中方團長最初是姚廣，後來換了周南；英方團長最初是柯利達，後來也換了伊文思。除了這個談判代表團外，尚有一個工作小組，中方組長是柯在鑠、英方組長是衛奕信。除此之外，還有第三個層次的小組，中方代表是魯平、英方是麥若彬，這是專門談新界土地契約的。整個談判到了後期，三個層次一起進行談判，即周南對伊文思、柯在鑠對衛奕信、魯平對麥若彬。最後是按鄧小平所訂的時間完成，即在八四年九月二十六日草簽。英方是以白皮書公佈，中方是以草案形式發表。一直到戴卓爾夫人到中國才正式簽署中英聯合聲明。

中英整個談判過程充滿了相互間的矛盾和爭論，但是，總體來說，主導因素是中英合作。

有人認爲中英鬥爭是主要的，但實際上是有鬥爭也有合作，合作才是主要一面。如果沒有中英

雙方實事求是的合作，香港問題的解決就決不會如現在那樣，英國在香港問題上有過反反覆覆，由最初的不想交回香港、以至以主權換治權等許多方案的提出，前任掌璽大臣在香港提出過成立一間公司，股東是中國，由中國做董事長，聘請英國做總經理；又有許多資本家提出將香港交予香港的資本家，每年上繳若干予中國，即由香港資本家做股東，請英國人做總經理。類似方案繁多。

總體而言，如果沒有英國政府實事求是和理智的合作態度，香港問題根本不可以獲得今天如此順利解決。這是我對收回香港主權的中英關係的基本觀念。應如何看待這十三年來的中英關係，中方內部是有不同的觀點，有些人認爲中英之間是以鬥爭爲主；亦有人認爲中英之間是有鬥爭亦有合作，並以合作爲主。我是屬於後面一派。

中國的傳統政策，是鬥爭要「有理、有利、有節」，要「留有餘地」，從來不主張將任何空間封死，但在這十三年過程中，特別是彭定康來港出任總督之後，產生了許多鬥爭，許多都沒有留有餘地，造成大家各走極端，對香港不利。

到了現在，中英之間的關係似乎仍是對立，但基於中英政府的合作主導因素，我相信這個對立狀態很快便會消失。

英國工黨政府上台後，期望可以擺脫香港問題的干擾，重建中英相互合作關係。

中英重建友好勢所必然

英國新任首相貝理雅說：「香港應成爲中英的橋樑而不是包袱。」中國副總理錢其琛在五月下旬的籌委會上立即作出了回應，表明中國政府希望與英國恢復合作關係。以中國立場而言，只有和英、法、德等國建立密切合作，才能穩定中國和歐洲這一極的關係。

在香港回歸慶典中，中英派甚麼人出席也是雙方會談的議題。至五月下旬，英國只宣佈了查理斯王儲參加，其實中方很希望英國的首相出席大典，相信香港人也有同樣希望。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和總理李鵬會出席慶典，六月上旬，英國宣佈首相貝理雅也將來港出席儀式。

中英九七後重建友好合作關係是不可擋的趨勢、是保證香港繼續繁榮安定的一個因素。當然，最核心的因素是中國政府落實「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的政策，但英國人統治了香港一百五十年，與香港有千絲萬縷的關係，特別是英國人在香港仍有非常重要的經濟利益，因此，中英恢復合作關係，對香港繁榮安定是很重要和有幫助，這在九七年七月一日之後必會出現。

談及英國人在香港的經濟利益，不得不承認他是有龐大的基礎，但也得承認英資財團過去出現過幾次失誤，形成了今日華資與英資並駕齊驅甚而超越英資的局面。英資第一個失誤是在一九六七年動亂事件後，英資財團大幅度撤走，令到八大英資財團所剩無幾，造成了華資財團興起。第二個

失誤的地方是中英談判時，英國財團對香港前景不看好，紛紛將資金撤離香港，最顯著的財團是怡和集團，將三分之二的資金撤出。但是，她留在香港的三分之一的資金，替她取得了整個集團三分之二的利潤，而在海外的三分之二資金，只取得整個集團三分之一的利潤，這明顯是因撤出香港而造成的損失。由於怡和在上海曾經吃過虧，所以緊張一些，她會慢慢重回香港。正由於英資財團的撤出，形成了華資財團實力的漲大，更導致華資財團吞併了怡和屬下的九龍倉。九龍倉和置地是怡和的兩翼，九龍倉失守，令怡和十分緊張，立即將怡和與置地交換股份，防止了另一翼失去。時至今日，華資財團不斷壯大，但英資仍有一定的實力，對香港的經濟產生影響。



董陳配——香港特首董建華與原任港府布政司的特區布政司司長陳方安生合攝於一九九六年十二月。(明報資料室照片)



香港特別行政區兩位重要的司級官員：財政司長曾蔭權(上圖)和律政司長梁愛詩(下圖)。(明報資料室照片)



第四章　九七後香港的前景

青馬大橋已成爲香港的新標誌，也象徵着香港的前景美好、樂觀。

從中英聯合聲明簽署至今已有十三年，在十三年前，相信從鄧小平到香港絕大多數人，都沒有想到九七年回歸是這樣平靜地渡過。回想在八十年代初期，那時想像九七回歸是很令人擔憂的。一九八二、八三年時，香港的房地產價格下降了五成，港元兌美元的匯率由四點五比一下降到九點一比一，整個市面很蕭條，而且很多人移民外國。

戴卓爾夫人於一九八二年九月到北京訪問之前，同年八月，鄧小平在家中突然接到一個情報，說是整個香港的經濟處於很嚴重的地步，所有大財團都要將資金往外撤，鄧小平當天傍晚就召集所有政治局委員到他家中召開緊急會議；因爲當時中國尙未正式對外宣佈於九七年七月一日恢復行使香港主權，如果香港經濟這時垮掉、社會大亂，中國怎麼辦？但經過研究後，覺得這情報不太可靠。這是戴卓爾夫人訪華前中共政治局最後一次討論香港問題的會議。

現在很多人對香港前景仍有很多憂慮，這是正常的，有些人想，雖然現在香港很平靜，但政權移交後是否仍能這樣？很多外國傳媒更說香港死了，香港人當然不會這樣想，但心裏仍難免有很多憂慮。

一九八二年九月戴卓爾夫人訪問北京時對鄧小平說，如果英國人不再管治香港，整個世界會對香港失去信心，香港就會處於災難性的結果。當時鄧小平表示不相信會這樣，他說，如果眞的是這樣，就讓它來吧，中國仍要勇敢地作出收回香港的決策。

到現在，事實證明鄧小平當年的看法是對的，香港回歸中國，並無出現災難性結果的迹象。

十三年平穩過渡世界奇蹟

在世界上殖民地變革歷史中，長近十三年的平穩過渡，是很少有、很突出的情況，可以說是世界上的奇蹟。而在這十三年間，整個香港政局平穩、社會穩定，經濟繁榮，原來估計可能發生的情況都沒有出現過，更是世界奇蹟。

一個殖民地的變革，通常有人會提出很多種要求，包括獨立要求。但十三年來，香港並無任何政治團體或政治明星公開提出反對中國收回香港或提出要求香港獨立；可能個別人內心有這樣的思維，但並無人公然提出。

最近民主黨決定，該黨正副主席李柱銘、楊森、張炳良和秘書長羅致光，將出席六月三十日的政權交接儀式，因爲要表明民主黨贊成香港回歸中國的基本立場。

總言之，在整個過渡期內，香港並無出現其他殖民地變革過程中必然有的獨立要求，這在世界上很少有。

雖然中英之間在過渡期內曾有很多爭拗，但在十三年內，中英的合作是主要的。

鄧小平曾對戴卓爾夫人說，希望英國能跟中國合作，維護香港的穩定繁榮，否則，中國對收回香港的時間和方式會另作考慮；換言之，收回的時間不一定在九七年，而收回的方式也不一定是和平的。

中國政府是把香港會否發生大亂作爲英國是否跟中國合作的標誌。香港的十三年來的平穩，也證明了中英之間十三年來是以合作爲主的。

中國方面曾經設想，假如有甚麼破壞香港的因素，國民黨可能是其中一個。但事實上在十三年來，國民黨對香港並無作出破壞行動。

國民黨從一開始就不承認中英談判和中英聯合聲明，他們不能說贊成中華人民共和國收回香港主權，因此在香港回歸問題上，他們十三年來都找不到定位，直至最近，國民黨官員才想到一個恰當的說法，說是「香港回歸於中華民族」。

回想五、六十年代，國民黨在香港作過很多破壞行動，包括五十年代的九龍暴亂事件，爆炸喀什米爾公主號飛機事件，他們的爆炸目標原來是周恩來總理。

近二十多年，台灣在香港的力量已急速衰退，想搞事也搞不起來。國民黨在香港問題上實際是採取克制態度，這也是香港保持安定的一個因素。

香港社會也很安定，只曾在八十年代早期發生過一次輕微的的士司機罷工事件，那次新華社香港分社很緊張，幾位副社長趕到現場去，幸而事件瞬即平息下來。

十三年來香港的穩定，又怎能想像九七之後會出現大亂？

整個過渡時期十三年間，香港經濟穩步上升。現時，在「亞洲四小龍」中，新加坡和香港是最活躍的。如非中英發生爭拗，以致九號碼頭和新機場的進度受延誤，香港的經濟進展還未必會遜於



一九八五年七月五日，胡耀邦、鄧小平、李先念、彭眞等中國領導人，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會見基本法草委會全體委員並合影留念　(中新社照片)

新加坡。

香港過渡期內的經濟穩定發展，也是當年鄧小平和其他中國官員意料不到的。

香港十三年來的經濟是戰後以來最好的。十三年來，只有短暫的停滯，並無出現危機。原先各方面估計過渡時期可能出現的各種經濟危機，都沒有出現過。

香港在過渡期內，並無出現世界上其他政權轉移過程中財團大量轉移資金的情況，這在歷史上可說是奇蹟。至於怡和撤資的做法其實只是買保險，在海外註冊，(但怡系股票在新加坡上市表現不好)，資金並不調出去。

十三年來，香港原有的一些大財團的資產普遍增值十倍，例如郭炳江家族、恆基兆業集團和李嘉誠長實集團等，都是在世界富豪榜中有數的超級富豪。還有不少新冒起的財團。

這些情況正好回應了李嘉誠當年的預言：不怕九七的就會成爲第三代財團。而這些也是中國官員在八十年代想像不到的事。

八十年代初，香港有些人對香港前途欠缺信心，人心惶惶，很多人都想移民。但是，十三年來，香港人移民總數爲六十萬，平均每年五萬，是正常的移民數字。

從過去看將來，十三年過渡時期出現的穩定與繁榮的奇蹟，又怎會在即將實行的政權轉移之後而突然受到破壞？

我們再來考察一下，十三年來保持香港繁榮穩定的要素是甚麼呢？在九七年七月一日政權轉移



一九九〇年二月十七日，鄧小平與江澤民、楊尚昆、李鵬、萬里等領導人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會見基本法全體草委，圖爲鄧小平與草委之一的李嘉誠握手。（新華社照片）



李嘉誠早年曾預言：「誰不怕九七誰就可以成爲第三代財團。」事實證明香港過渡期內確出現了很多新財團。（明報資料室照片）

後會否受破壞？

最帶根本性的因素是中國的強大。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後，有非常好的發展勢頭，不可能再走回頭路，中國現在是世界上最活躍的市場，全世界都在注視中國這個大市場，中國現在的國力是一九四九年以來最強的。

香港人已體會到中國近年來的變化。過去，香港人對香港前景沒有信心，是因爲對中國沒有信心，而現在對中國的發展已逐漸有信心。當然，中國仍有很多需要批評的地方，例如，遲遲未實行政治改革、社會風氣敗壞等等，但總體而言，中國是在發展中，所以人們對中國的政策已比較有信心。

我自己在八十年代初期，直接參與起草中國對香港的政策，做過很多調查研究工作，其實當時的信心是不大的，因爲無論方案寫得怎樣好，假如中國的情況不好，甚麼也是徒然。

當年我們也沒想到中國現在會有這樣迅速的發展。

中國好，香港更好！

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就，正是香港繁榮穩定的第一要素。董建華說：「中國好，香港更好。」這樣說是對的。

第二個因素是中國政府提出的「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的政策合情合理，符合香港的實際情況，香港人對這些政策也逐步有信心。

現在香港回歸中國大局已定，香港繼續實行資本主義制度已不成問題，香港人對港人治港的存疑亦已減少，港府原有的司級官員全部過渡到特區政府，董建華還向北京要求給予更大的自主空間，以確保香港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香港人對董建華基本上是有信心的。

第三個因素是全世界國際力量都要保住香港，沒有一種國際力量是想摧毀香港的。

英國在香港十三年過渡期內，與中國合作爲主，歷史會記錄中英合作在世界上的典範；而其他方面，無論美國、日本、台灣，也是希望香港保持安定繁榮的。

台灣方面的心態其實是很矛盾，對香港九七年後前景的心態是——又想香港死、又怕香港死。因爲台灣反對「一國兩制」，很怕「一國兩制」在香港實踐成功；但是如果「一國兩制」的構想在香港實踐失敗，中國透過和平方式解決統一問題的希望也就落空，那時中國對解決台灣問題就未必會採取和平方式。這又引起台灣恐懼，因此，台灣的心態很矛盾。

不管怎樣，台灣在香港是要求生存，台灣非常不想香港亂，否則台灣在香港的力量也會受到很大破壞。

世界上與香港關係最密切的力量：英國、美國、日本、台灣，沒有任何一方想破壞香港的安定

繁榮。相反地，他們都希望保住香港的現狀；中國當然更希望香港安定繁榮。換言之，世界上任何力量都希望香港生存，這是十三年來香港保持良好狀態的第三項要素。

香港是「操弗」才過九七

至於第四項要素，是香港賴以生存的命脈在這十三年內仍然發揮作用。香港能夠對中國提供的作用，十三年後會比十三年前大得多和廣泛得多。中國在早期利用香港無非是出口、運輸、或依靠香港搞一些情報等。廖承志在六十年代對我們說：「你們在香港工作第一是錢、第二是錢、第三是錢。」周總理也說過香港是天文台、氣象站、發射站。但實際上過去中國對香港利用很少，最近十三年，中國對香港的利用是廣泛得多了。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資訊中心的地位和運輸中心的地位都得以延續，這也是香港的本錢。可以說香港是「操弗」才過九七的，香港歷來從未有現在這樣良好的狀態。

我們再考察一下，以上四個要素，九七之後會不會改變？

中國現階段的發展勢頭仍然很好。反正中國是不可以倒退的，如果中國在幾年內能解決國營企業的問題，中國的發展會出現另一番新景象。近來世界上許多人對中國的看法和估計是錯誤的，例如前年美國國防部白皮書曾指出：鄧小平死後中國會出現四分五裂，甚至有七成機會會如蘇聯般瓦

解。當時我已在報章上加以反駁，並強調江澤民的地位穩固，在國內已沒有對手。現在的時代已不同，誰可掌權要視乎政績，並非如以往倚靠威望，只要能將國家搞得好，地位就會穩固。事實上，中國自「六四」之後，最高層的政治局常委已經持續八年穩定，這是過往從未試過的。作為中國最核心的領導層在持續八年來從來未有變更、從未有人被打下台，這在中國歷史上是從未出現過。因此，中國在可見的將來會繼續發展，而且發展的勢頭非常好。

至於中國對香港政策會否有改變的問題。實際上「一國兩制」是不可以改變的，因為要維持一個與西方有密切聯繫的資本主義的香港，是中國本身的需要。凡是有需要的政策便是有誠意的政策。中國既然需要香港，又有何道理會自己搞亂自己？「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政策，打點折扣或會有可能，但絕不會完全改變。

第三個要素是，美國、英國、日本、台灣等，任何與香港有密切關係的力量，都希望香港保持安定繁榮、保持如目前般與他們的聯繫。到目前為止，沒有任何力量想損害香港的總體情況。想從競爭中取代香港某方面的地位或會有之，如台灣便是一個例子；但想摧毀香港而取而代之，基本上是沒有的。

第四，展望香港的將來，仍然充滿活力。現在越來越多的大陸公司來港上市，大大增加香港股票市場的活力。



魯平與港督衛奕信爵士合攝於一九九一年。(明報資料室照片)



中英聯合聯絡小組中方首席代表郭豐民與英方首席代表戴維斯，攝於一九九四年九月。（中新社照片）



中英聯合聯絡小組專家組長陳佐洱與鮑雅倫，攝於一九九五年六月。（明報資料室照片）

在這十三年過渡時期，香港保持如此安定繁榮和穩定的局面，而現在仍繼續發展，試問有何理由在七月一日之後，促成這些發展的基本因素會全部改變！

我對香港的未來有條件但帶有樂觀的預測。當然，任何發展都是有條件的。如果中國搞不好，香港就會大亂；假如中國重現文化大革命時的局勢，我相信香港人會如越南船民般坐船逃走，這就是條件了。

因此，香港眞正要比以前更好，前提條件是中國要好，要有相當多時間保持中國的經濟向上發展、政局繼續保持穩定，這當然不是香港人的範圍所能控制，這是中國內部領導層的責任了。香港最核心問題是要保持「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能長時間維持。香港最根本的是要保持與西方世界有密切聯繫的資本主義社會，九七之後，要完整地維護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只有保持這種特性，香港才能眞正充分發揮其作用。中國對香港實行特殊政策的根本問題，就是要保持這種特性的香港才對中國有利，故此只有維護這種資本主義制度才能充分發揮香港的特點和活力、才能繼續繁榮、才能繼續發展國際金融中心、資訊中心和運輸中心的地位：繼續發展香港成爲全世界進入中國市場的必要通道，也是中國與西方溝通的主要橋樑。香港假如沒有了這些優勢，前景就令人擔憂了。

中國內地有許多城市會和香港競爭，但是，不可能取代香港的特性和地位。例如上海的經濟實力遠遠大於香港，但始終無法取代香港，因爲香港是資本主義社會，在經濟和許多方面是與其他大

陸城市割離的；反之，上海是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的一部份，過去，財政收入幾乎要全部上繳，連簡單再生產的資金都不能維持。在實行改革開放之後，上海的情況已獲得改善了很多，但不管如何，中央財政仍是要靠賺錢最多的地方支持。許多省級領導對香港是萬分羡慕，因爲他們千方百計希望減少上繳，國內搞財政的官員，最大心思是如何不被中央發現「金庫」；但中央對香港的政策卻公開聲明是毋須上繳，即使其它城市將來有進一步發展，頂多是與香港競爭。上海、廣州等不可能取代香港，在大家競爭下，便要視乎香港人是否優勝過它們了。

我對香港的前景是樂觀的！



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會見預委會委員。(新華社照片)



中國副總理、籌委會主任錢其琛在北京人民大會堂主持籌委會會議。(新華社照片)



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一屆行政會議成員。(特首辦公室照片)



香港特別行政區臨時立法會會議。(明報資料室照片)



附錄一

九七之後香港會更好

一九九七，不是香港的大限，但是，它確實是香港一個新的歷史轉折，香港人對九七之後的香港抱有各種想法，是完全正常的現象。究竟九七之後的香港會變好？還是會變壞？抑或大體上可以維持現狀？這不能憑主觀推斷，需要根據客觀形勢實事求是的分析，才能眞正釋香港人之疑。

決定性的因素是北京的政策誠意。

北京公開宣示的政策，是九七之後對香港實行「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特殊政策。香港人歡迎和擁護這個政策，但是，對北京的政策誠意，以及能否眞正貫徹執行，抱有疑慮。

其實，政策的誠意體現於政策的需要。凡是有需要的政策，就是有誠意的政策；凡是沒有需要的政策，它的誠意也就值得懷疑。

北京對香港的決策依據是甚麼？最根本的因素，就是中國需要一個與西方經濟有密切聯繫的資

本主義的香港。過去如此，今後在可見的將來，中國還沒有任何一個地方可以取代香港的地位。

五十年代，西方強國整體地對中國封鎖和禁運，而且實行得非常嚴厲，香港成了中國通往西方世界的幾乎是唯一的通道。從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末的三十年，香港是支援中國經濟建設的重要基地。中國的出口貨主要通過香港轉銷世界，中國的外匯主要通過香港取得。因此，北京決定香港的工作方針是「長期打算，充分利用」。有位中央負責人對在香港工作的幹部說：堅持香港工作第一是錢，第二是錢，第三是錢。也就是說，核心任務是利用香港支援中國的經濟建設。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國力是大大增強了，與西方經濟的聯繫也擴闊了很多，香港有些作用已經消失，有些作用卻又加強，總的來說，中國需要和利用香港是擴大而不是縮小。

內地城市無法取代香港

有人擔心，未來會不會有另一個中國城市可以取代香港的地位?上海，是全國經濟中心，它的實力遠超於香港，但是，它是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不能像香港那樣實行完全的自由經濟制度。香港作爲自由港、國際金融中心、運輸中心、資訊中心的地位，並不容易被其他中國城市所取代，除非香港自已政策失誤，失去了香港獨特的優勢。而這一點，正正是北京所不願見到的事。

北京對香港採取特殊政策的根本出發點，是中國需要一個和西方經濟有密切聯繫的、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香港。北京政策的誠意就體現於中國的需要之中。只要香港保持對中國有特殊作用的價值，中國對香港的政策就不會改變。

過去的歷史，通常都可以作爲觀察未來發展的依據。

從八四年九月《中英聯合聲明》草簽到現在，已經過去了十二年零三個月。世界上殖民地地位的改變，有如此漫長的過渡時期，歷史上非常罕見。

這十二年零三個月，香港發生了甚麼?它的平穩和持續繁榮，完全出乎世界、出乎香港人、出乎北京的意外。

第一，香港沒有出現過有組織、有實力的反對中國收回香港主權的政治力量。世界上幾乎所有殖民地，在地位發生根本性變革時，無一例外地都發生過要求「獨立」之類的政治要求和運動，唯獨香港沒有。這個根本性的特點，保證了十二年香港的平穩與繁榮。

第二，十二年來，香港沒有發生過任何政治動亂和社會動亂，香港社會比之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還要平穩。八十年代初期中國剛剛提出九七收回香港主權時，北京的領導人曾經估計：在過渡時期中，小亂不可避免，中亂很可能發生，力爭避免出現大動亂。但結果，不但沒有發生大亂，沒有發生中亂，連小亂都沒有發生。中英之間有過激烈的爭拗，但香港沒有出現政治動亂和社會動亂。

第三，香港保持了十二年的持續繁榮，雖然有時發生局部性的經濟疲弱，但沒有發生過危機。

當然，經濟集團會作預防措施，「遷冊」就是一種預防措施，但是，沒有任何一個有實力的中外資經濟集團，把資金大量撤離香港。這十二年的繁榮，比之前三十年還要好。香港政府的外匯儲備，積存高達千億元。最富有的幾個家族，總資產增加十倍以至十幾倍。這又是使世界上所有觀察家都跌眼鏡的事。

第四，香港沒有發生眞正的移民潮。十二年間，香港移民總數是六十萬，平均每年五萬，這是個正常數字，沒有九七，大體上也會是這樣的移民數字。香港是個移民城市，每年都有大量人口移入香港，又有大量人口移民外國，過去如此，這十二年的過渡期也是如此。

這十二年零三個月，香港能夠如此平穩地渡過，而且比過去發展得更好，這是世界歷史的奇蹟。

主要因素是甚麼？

首先是中國收回香港主權，以及九七之後對香港實行「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政策，得到香港人廣泛接受和認同，也得到世界上的認同。香港人的疑慮，是怕這些政策不能眞正貫徹落實，而不是否定它，這是接受和認同中的疑慮。

中國改革開放難走回頭路

更重要的則是中國改革開放政策的成功。香港人的疑慮，其實是對中國的疑慮。按香港人的觀點，中國還有許多不如人意的地方，但是，沒有人可以否定中國改革開放政策的成就，而且，香港人相信，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只能堅持到底，不可以半途而廢，更不可以走回頭路了。雖然有「六四」這樣的波折，以及還有不少不如人意的事，香港人比之以往，對中國是有信心的。

再其次是香港始終保持着「最能賺錢的地方」，使得世界上所有國家和地區，包括英國、美國和台灣，都期望保持一個繁榮的香港，都要利用香港，不想破壞這個「聚寶地」。雖然有人假設某些國家和地區要破壞香港的安定繁榮，但實際情況不是這樣。這些因素保證了香港十二年的安定繁榮，而這些因素並未消失，還在持續，也就沒有理由對九七之後的香港變得悲觀。

當然，九七始終是香港歷史的重大轉折，過去好，不能代表以後都好，不能保證以後都好。要使得九七之後的香港比過往更好，是需要香港人自己去爭取的。

根本問題是要維護九七之後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保存一個與西方世界有密切聯繫的資本主義的香港，才能發揮香港的優勢，並且保持香港的繁榮。中國需要的是這樣的香港。只有這樣的香港，才能爲中國提供獨特的不可取代的作用，也只有這樣，才能保證北京對香港的特殊政策不改

變。

「井水不犯河水」最實際

有人認爲，不是怕「一國兩制」不能實踐，而是怕「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政策不能貫徹。實際上，它是建基於信奉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共產黨人，不可能搞好資本主義的香港這個理念之上。因此，「一國兩制」是本，「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是與之相配合的。只要「一國兩制」的政策不變，「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在執行中打些折扣，影響也不會帶根本性。

當然，還有一個「兩制」之間的關係要正確地處理。香港和中國內地的政治文化有很大差異，政治視點的不同和矛盾，總是正常的存在。這裏用得着江澤民說的那句話：「井水不犯河水」。香港人期望大陸不要干預香港，當然也就同時要求香港不要干預大陸。大陸民主的發揚，是靠大陸人民自己去爭取的，不能由外力去做「救世主」，這只能有損於香港和香港人的利益。

香港還有自己的內部問題。也就是九七之後，要紓解香港的內部矛盾和社會矛盾，其中主要是紓解中方和民主派的矛盾，紓解貧富之間也就是資產者和基層勞工的矛盾，這樣才能保持香港社會的穩定。

維護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保持香港的安定繁榮，理智地處理好香港和內地的關係，這三個方面是九七後香港人求生之道。從過去看今後，香港人沒有理由悲觀。九七之後的香港，會比過去更好。

（原載一九九七年一月一日香港《明報》）





香港新機場的藍圖(上)與建築工程進展(下)。



附錄二

董建華以「平衡哲學」為治港理念

董建華有句口頭禪，就是在這個問題與那個問題之間，尋找一個平衡。

處理公安、社團條例的修訂就非常突出，他公開說明要在公民自由與社會秩序中間，尋找一個平衡。

在經濟發展的布局中，他說他將從整體上考慮環保在發展中的位置，力爭使環保同經濟發展取得一個平衡。

除了這些公開宣示的「平衡哲學」外，更多的是不公開宣示的「平衡哲學」。

在中央領導與「港人治港」中間，他以「平衡哲學」處理其中關係，因此，他要頻頻上京溝通。

他在安排行政會議班子時，要在親中派與中間派之間，尋找一個平衡安排。

他把原來的競選對手楊鐵樑拉入行政會議也是一個平衡，他大力支持李國能任首席大法官，更



董建華以「平衡哲學」理念治港，成功紓解香港不少內部矛盾。(明報資料室照片)

是一種平衡的典型。

他反對中資企業協會成爲立法會議的功能團體，也是要從中資和外資之間尋求一個平衡。短短幾個月，董建華以「平衡哲學」的理念治港，已經非常突出。應該說，「平衡哲學」適應香港特殊情況，適應香港客觀實際，是當前香港所必須，是穩定香港的柱石。

九七回歸，雖然是香港歷史最重大的轉折，但卻不是一場傳統所說的「革命」，它最需要的是不變與穩定。不僅需要政權交接的平穩過渡，更需要的是保持長期穩定。

但是，所有歷史轉折時刻都不可避免的，是群體政治取向的極端化。

中、英的長期爭拗，是極端化的一種體現。

民主派對中方的任何政策、措施，都加以懷疑、抗拒；而中方則把民主派視爲敵人，要全面封殺，是極端化最突出的體現。

在香港政治社會中，長期以來幾乎沒有中間派的位置，正是政治取向極端化的產物。

政權轉移打破了原來的利益分配，不管如何，總要出現或多或少利益再分配的現象。

中資與外資，特別是與英資的利益爭奪，不可避免，華資財團之間的利益爭奪也不可避免；商界和勞工界之間也要爭奪社會資源。

政治上，原有政府班底和新參加到特區政府的力量，不可避免要產生矛盾。尤其是中方力量過

去長期被排斥，一旦融入特區政府之中，引起了各種各樣的疑慮和矛盾，是很正常的現象。「港人治港」意味着某些人要失去權勢，也就必然要引起這些人的抗拒。最近一次籌委會議出現的爭論，本質上就是失去權勢的人，力求要保留「剩餘權力」的一場鬥爭。

在如此矛盾複雜的組合中，要避免各種各樣的利益衝突發展爲對抗，從而保持香港局勢的穩定，唯一的辦法是平衡各方利益，紓解各方矛盾，任何的偏重，都很容易激起衝突。

因此，董建華以「平衡哲學」作爲治港的理念，是正確而穩定的做法。

當然，平衡不是絕對的。平衡本身不是目的，目的是要紓解各種矛盾，保持香港的穩定。對香港存在的各種矛盾，即使不能消除，也要紓解，使之不致發展爲對抗。

在處理中央領導和「港人治港」這對矛盾中，董建華是淡化這個矛盾。他強調必須處理好與中央領導的關係，取得中央領導絕對信任，才能眞正實現「港人治港」。「港人治港」是要爭取才能實現的，問題是採取甚麼方法去爭取。

對中央領導溝通爲主

一種是民主黨的方法，就是強調敢於對中方說「不」。這是種「好鬥公雞」的做法，表面上轟

轟轟烈烈，取得港人喝采，但實際是擴大矛盾，損害「港人治港」的實現。

另一種是董建華的方法，對中央領導以溝通爲主，尊重中央的領導，幫助中央領導了解香港實際情況，說服中央領導接受港人意見。在這個基礎上實現「港人治港」。

事實證明，董建華的方法已經取得了初步成功。

他成功地取得了中央同意全部司級官員過渡到特區政府班子。他使中央領導遏抑着那種視司級官員爲「彭定康走狗」的極左思潮。

他成功地說服了中央領導「中止」或者是「結束」籌委會的工作，免得在特區政府成立之後，頭上還有個婆婆指手劃腳。他說服中央領導遏抑着那些戀棧「剩餘權力」的人。

他成功地說服中央領導汲取還原法例造成被動的教訓，在制訂第一屆立法會選舉辦法時，給特區政府留下空間。這項成功，使董建華在今後處理和民主派的關係時，有廣闊的迴旋餘地。

他成功使李國能出任首席大法官，排除某些中方人士支持的另一人選。李國能的任命，不僅法律界喝采，傳媒和民主派都喝采。

當然不能說董建華已經取得完全成功，但是，他以「平衡哲學」作爲治港理念，已經成功地紓解香港內部若干矛盾，成功取得中央領導的理解和支持，取得自己廣闊的自主空間，使「港人治港」得到落實的希望，保持了香港的穩定。

現時在董建華面前的還有兩大問題：一個是和民主派的關係。由於中方過去對民主派的僵硬做

法，給董建華留下沉重包袱，要紓解和民主派的矛盾是比較困難的，但是，無論如何，這個矛盾即使不能消除，也一定要紓解。因爲只有紓解這個矛盾，才能保持香港的長期穩定。

面對的兩大問題

過去，董建華說過一些錯話，比如，一而再地重複中方語言，指摘民主黨「逢中必反」，增加了自己和民主黨的矛盾。現在，董建華已經取得了相當的自主空間，就應該主動地和解和民主黨的關係。民主黨要爭取九七後的位置，採取以批判爲主的反對黨立場，採取某些反對動作，這是資本主義社會政治遊戲所必然，董建華應以平常心待之，不必過於緊張。

另一個是要處理好親中營壘中正在興起的內部矛盾。某些人過去支持中方，懷有各種目的，一旦自己的慾望不能實現，就會反過來成爲特區政府的阻力。中方內部也有人戀棧「剩餘權力」。兩種力量的結合，會給董建華許多困難。最近一次籌委會議的緊張與爭辯，說明這種阻力的存在。

對這個問題，董建華只能依靠中央政府自己去解決，自己不要捲進中方的內部矛盾之中。時間是可以解決問題的，還有三十多天特區政府就正式成立，戀棧「剩餘權力」的人總要消失。

董建華在香港人中的威望，時起時伏，部份原因是董建華自己的言語失誤，部份原因是中方留

給董建華的包袱，使他陷於被動，但是，更大的核心原因，則是相當多的香港人，對他的「平衡哲學」治港理念的不理解。

不理解只是暫時的，只要董建華不犯錯誤，以這種治港理念做出成績，使香港保持長期的穩定繁榮，也就終於會讓世人知道，以「平衡哲學」治港，符合香港的實際。

（原載一九九七年五月二十七日香港《經濟日報》）

附錄三

香港勢成中美角力場

美國政府高規格接待李柱銘，表明美國對九七之後的香港極感關注。

美國準備塡補英國的眞空，九七之後代表國際社會，監管中國政府對香港特殊政策的實施。這樣，九七之後，香港勢必成爲中美的角力場。香港和香港人捲在其中，也就勢將引起無窮煩惱。

美國關注香港的法理依據是：《中英聯合聲明》是國際聲明，具有國際約束力，中國九七後對香港實行的特殊政策，應該受到國際監管。

中國政府表示強烈反對。中國政府認爲，《聯合聲明》的國際約束力，僅僅是第一和第二條，也就是九七年七月一日，英國政府「將香港交還給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政府則從該日起，「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至於九七之後中國政府對香港行使甚麼政策，純屬中國內政。因此，《聯合聲明》的第三條和附件一，僅僅是中國政府單方面的聲明。這一點，在中英談判中，中國政府早已說淸楚。

但是，西方國家認爲，《聯合聲明》的第七條寫明，中英兩國政府同意，「上述各項聲明和本聯合聲明的附件均將付諸實施。」第八條又寫明：「本聯合聲明及其附件具有同等約束力。」因此，《聯合聲明》的國際約束力，應該包括聲明的全部條款和文字。

美國欲以香港問題牽制中國

其實，法理依據的爭議並不重要，問題的實質是，美國要把香港問題作爲牽制中國的一條繩索，就和人權問題一樣。正因此，美國國會才在通過一連串中國人權問題議案之後，又增加了香港問題議案。

本來，香港是英國的殖民地，要監管也只有英國，輪不到美國。但是，英國的國家實力和對世界的影響力，已經急劇衰落。雖然它統治香港已有一百五十年，但退出之後，也就再無力影響香港，不能不求助美國來填補眞空。而香港的抗中力量，也因爲英國的無能，而轉向美國尋求支持。

國際社會歷史上不乏這樣的先例。五十年代的越南，原屬法國殖民地，奠邊府戰役慘敗後退出，美國就迅速塡補法國的空間。南非原來是英國的殖民地，現在，美國的影響力也遠遠大於英國。

因此，九七之後，香港問題所存在的中英矛盾，會迅速轉化爲中美矛盾。或者是以中美矛盾爲主，中英矛盾爲次。

由於國際戰略的對立，中美之間是不可能建立起夥伴關係的。雖然美國已經沒有能力再硬打硬地對中國實行遏制政策，從去年美國大選後開始，美國對華政策出現戰略性的轉變，強調要和中國交往，把中國拉入國際大家庭，用國際政治遊戲規則來制約中國。但是，美國千方百計地要制約中國向世界強國發展，從來就未改變過，遇有機會，總要給中國找些麻煩。

美國手上要拿着一些牽制中國的繩索。台灣問題是最粗的一條，人權問題是另一條，今後還要增加香港問題一條。

港人贊同回歸但不熱烈

中美之間對香港問題的角力，和台灣問題、人權問題顯著不同。它不會發展到如台灣問題那樣尖銳，卻比人權問題複雜得多。最根本不同是中美之間在香港並無根本性的利益衝突。中國爲了自己的利益，要保留一個資本主義的、安定繁榮的香港；美國同樣爲了自己的利益，需要一個資本主義的、安定繁榮的香港繼續存在。

中國爲了自己的利益，要對香港實行「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政策；美國同樣爲了自己的利益，贊同中國的政策。爭論之處是怕中國宣佈的特殊政策不能全盤落實。

但是，香港問題和人權問題不同。在人權問題上，美國在中國內部找不到呼應者，在國際上的呼應也越來越弱。海外民運是一批烏合之衆，沒有任何政治影響力，國內人民也不屑對它一顧。但香港問題既在國際間有強烈呼應，在香港內部也有強烈呼應。民主派當然是美國的強烈呼應者，廣大香港人也並不排斥美國的干預。這對中方來說，雖然很痛苦，卻是不能不如實承認的客觀現實。香港人對九七回歸呈現非常複雜的心態，和內地人有極大差別。這一點，中方常常不能理解。

香港人贊同回歸，但不熱烈；香港人不排斥回歸，但卻憂心忡忡。他們對中國還缺乏信心，怕九七之後把大陸一套搬到香港；他們擁護北京對香港的特殊政策，但卻擔心這些政策不能眞正落實。因此，香港人一方面不贊同美國干預香港的內部事務，另方面，內心深處卻歡迎國際勢力九七之後監管香港，使香港和香港人的利益多一層保障。這就是美國和中國角力的群衆基礎。而其複雜性也正在於此。

對美國干預應淡化處理

現在對未來前景還看不清楚。現在只能看到：美國準備塡補英國的空間；美國準備參加香港問

題的國際遊戲，美國準備利用香港問題作爲牽制中國的一條繩索。但是，中美之間的角力，究竟會發展到何種地步，還不清晰。

這裏，最重要的因素是中方的政策。如果中方對美國的干預淡化處理，不涉及到香港本身的運作，矛盾就不會過於激化。如果中方採取強勢處理，在反擊美國之餘，還要痛擊李柱銘、民主黨及其支持者，罵之爲「漢奸」，也就重蹈過去對英鬥爭的覆轍，香港局勢也就難以安寧。這正是使人憂心之處。

香港的繁榮是靠各地資金維持的，香港的存在，最依靠它成爲中國與西方的通道和橋樑作用而生存的，一旦成爲中美角力場，香港的前景就會蒙上陰影。

現在就看董特首如何運用高度政治智慧加以化解了。

（原載一九九七年四月二十一日香港《明報》）



江澤民(中)與美國總統克林頓(左)及英國前任首相馬卓安合攝於一九九五年五月的莫斯科。(新華社照片)

附錄四

中共早有和江湖人物交往的傳統

我在浸會大學第一次專題演講，談及一九八四年《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前，我曾奉命和香港若干江湖人物會晤，向他們解釋中國收回香港主權的政策，要求他們制約自己，不要損害香港的安定繁榮。

這段故事引起了許多人的興趣，有些記者很驚訝，新華社官員怎會和江湖人物交往？其實，中國共產黨在奪取政權之前，和江湖人物交往，一直是項具有傳統性的特殊工作。共產黨對待社會力量有個基本政策，就是：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化消極因素爲積極因素。

江湖力量是種消極因素，但它是社會力量之一，雖然不是社會的主要力量，但是，這種力量會受各種政治力量所利用，某些時候，會起到相當大的破壞作用。因此，共產黨在奪取政權之前，並不忽視對江湖人物進行工作，把它列爲「化消極因素爲積極因素」的特殊工作之一。

共產黨的一些領導人，都曾親自主持過這種特殊工作，最出色的則是周恩來。

一九二七年，共產黨爲了迎接北伐軍順利進佔上海，曾經在上海組織過三次工人起義。第一、二次都失敗了，原因之一是起義隊伍無法穿越英租界和法租界，匯聚不起來。當時的英租界和法租界，是外國巡捕房和江湖人物把持的。

周恩來要聯繫杜月笙

周恩來到上海組織第三次工人起義，首先派中共上海市委領導人之一、上海市總工會主席汪壽華，去和當時上海幫會中最有權勢的杜月笙交往，成功地爭取到杜月笙、王曉籟在政治上站到北伐軍一邊。工人起義時，隊伍在英、法租界通行無阻。第三次工人起義的成功，這是個重要因素。

杜月笙其後投靠了蔣介石，但和共產黨的聯繫始終不斷。四九年上海解放前夕，杜月笙移居香港，周恩來和陳毅派人到香港聯繫，杜月笙派了兩個兒子回上海，通令上海所有幫會力量，在解放軍攻佔上海時，不得進行任何破壞活動，使上海解放前後，社會秩序非常良好。

在周恩來親自主持下，除派共產黨的黨員幹部，兼調動章士釗、朱學範等社會人士，長期對杜月笙工作，使杜月笙在北伐、抗日和上海解放三個歷史關鍵時刻，都從旁協助共產黨，起到特殊作

用，這是共產黨對江湖人物進行工作的典範。

中國收回香港主權，特點之一是有個長達十三年的過渡時期，如何保證這段長時期的安定繁榮，非常艱巨。

安定和繁榮是對孖生胎。沒有社會安定，絕不可以有繁榮；沒有經濟繁榮，社會安定也很難保持。

九七，是香港歷史的轉折。一般規律，這樣的時刻，很容易引致社會動亂。日本侵佔香港和日本投降這兩段時刻，香港社會都曾經發生過若干社會動亂。中國大陸的解放，又是一個歷史轉折時刻，香港也發生過一些動亂。五十年代，香港發生過多次由國民黨勢力主導的政治動亂，也發生過多次因經濟不景而引起的社會騷動。這些事件，幫會力量或多或少都曾參與其中。而在八十年代之前，香港主要幫會力量，政治上都傾向於國民黨一邊。

這種情況當然引起北京領導人的關注。八二年七月，我在北京參加對台工作會議，會後，廖承志找我談了一次，了解香港幫會力量的情況，以及他們的政治傾向。廖承志提出，爲了保證香港的安定繁榮，需要對江湖人物進行工作，爭取他們政治轉向，爭取他們支持我們收回香港主權和保持香港的安定繁榮，最少是不反對和不破壞。最後，廖承志把這項特殊工作交給我去做。

在這之前，七十年代新華社的領導就曾經有過這樣的任務交給我。周恩來和毛澤東逝世，新華社在舊中國銀行大廈開追悼會，爲了保證追悼會的安全和秩序，我曾經成功地爭取到江湖人物的協

助。但是，八十年代之前，我和江湖人物交往並不多，層次不高。因此，接受了廖承志任務之後，我需要花一年多的時間作準備。

八四年《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前幾個月，我開始約會幫會中人。內容其實很簡單，我向他們闡述中國收回香港主權的道理，闡述九七之後對香港實行的特殊政策，闡述我們對保持香港安定繁榮的關注，要求他們自我制約，不要做損害香港安定繁榮的事。他們聽後反應還好。對「不要做損害香港安定繁榮的事」，作了肯定的承諾。

事後，會晤情況寫成報告由許家屯上報北京。我知道，鄧小平看過這個報告。

「黑社會並不全是黑的」！

八四年十月三日，鄧小平會見香港國慶節觀禮團，講了一段話，提了兩個動亂因素。鄧小平說：「這裏我再講兩個問題，一個是黑社會，我幾次講過，黑社會並不全是黑的，愛國的還是多數，把自己當作炎黃子孫，有民族感的人還是多數。據了解，他們還是擁護我們收回香港主權和安定繁榮的。我們在這方面也要做工作，勸他們不要亂動手腳。我們總的看法是黑社會並不都是黑的，多數人是好的，但他們行動要有所節制，要他們自己節制。」

江湖人物當天就從電視上知道鄧小平這段談話，反應很好。

應該明確提出，鄧小平這段話是講兩方面的。一面是指出幫會力量是破壞因素，要節制；另方面也指出「黑社會並不全是黑的」，這句話其實是指他們的政治傾向，落腳點是「要做工作」。以後北京有些官員，經常引用鄧小平的話時，只講一面，當然也就引起香港社會的反感，對鄧小平的話也是種歪曲。

十三年來，香港社會一直保持平靜，因素當然很多，重視和持續地做江湖人物工作，爭取他們在政治上不破壞香港的安定繁榮，也起過相應的作用。

最近，澳門治安很壞，幫會爲爭奪利益火併，嚴重威脅澳門的安定繁榮，原因之一，正是長期不重視這項特殊工作的結果。幫會社會是個特殊社會，平時要有潤滑劑，衝突時要有「一言九鼎」的人物出來協調，澳門現在兩者都沒有。

中方做江湖人物工作，有嚴格規限。第一是從政治角度着眼；第二是以保證香港安定繁榮爲目的；第三，主要是保證過渡時期和政權交接前後的社會安定；第四是不過問、不干預警方打擊犯罪分子和犯罪活動的工作。

這是一種特定時期的特定工作。特定的環境是香港是在英國管治之下，政權不屬於中國。因此，政權交接之後，這種特殊工作就應有所區別、有所節制、有所疏離。

九七之後，特區政府就是中國的地方政府，而且實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政策，維持香港

社會安定，是特區政府的職責，特區警方如何處理幫會力量，如何維持社會治安，有它自己的政策，中方不應干預。

現在，國內多個部門都做香港幫會工作，而且做得相當投入。九七政權交接之後，就應該有所疏離，否則也就會干預香港警方的政策，干擾香港警方的行動和部署，也違反「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政策原則。

（原載一九九七年五月二十日《經濟日報》）



林思齊東西學術交流研究所(簡介)

林思齊東西學術交流研究所(簡稱林思齊研究所)於一九九一年十一月創辦，原名爲香港東西文化經濟交流中心。一九九三年十一月，中心易名爲研究所，以擴大其活動範圍及提高學術水平，且爲表揚蜚聲國際的前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華裔省督林思齊博士對研究所的支持，研究所現命名「林思齊東西學術交流研究所」。

研究所的目標爲促進海內外東西學術交流研究活動。香港爲國際貿易金融樞紐，佔地理優勢，身負促進東西溝通的使命。研究所以香港爲根基，不僅與太平洋沿岸各國攜手合作，還聯繫西方國家，跨越國界，使全球各地不同國籍不同文化背景的學術團體互相認識交流。

爲落實以上目標，研究所的成員來自世界各地。研究所各項團體活動由會員組成的董事會策劃。董事會成員包括各創辦及團體會員(享永久會籍)，及來自中國與其他地區的附屬會員。日常的行政工作由香港浸會大學教職員負責。

研究所的各項活動將以東西方關係、語言、文化、經濟、學術之研究為主導。除研究項目之外，已成立或籌劃中的活動計有師生交流、國際會議及暑期學習班等。

研究所基本運作經費由香港浸會大學承擔，研究及活動經費由各有關參與會員，及關心學術研究的社會人士捐款支持。

林思齊博士及思齊之友

林思齊博士恆常對大學表示關懷和支持。林博士是叱吒商場的成功典範。退休後積極參與國際慈善及社會服務工作，更獲加拿大政府授以勳銜及獲委任爲英屬哥倫比亞省省督，至一九九五年才榮休。林博士一直致力促進種族和諧工作，認爲溝通東西文化可幫助國與國之間互相了解，因此他大力支持成立林思齊東西學術交流研究所及興建思齊樓的計劃。

林博士預期這所國際性學術及教育中心「在目前及九七後均會是中港的重要溝通橋樑之一」。爲了協助籌集建築經費，林博士去信他的友好作出呼籲，並於一九九三年間穿梭港澳，親自爲募捐


DAVID C LAM BUILDING
SHAW CAMPUS
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香港浸會大學思齊樓

事情奔走。林博士的呼籲獲得不少社會賢達積極支持，至一九九五年秋籌得的款項接近港幣二千四百萬元。思齊樓於一九九五年十一月落成，而林思齊東西學術交流研究所亦負起促進東西溝通的使命，致力推動國際文化交流。

宿願竟成，大學及研究所衷心銘謝林博士及他的友好，他們包括：陳有慶太平紳士、陳俊博士及夫人、鄭裕彤博士、張松先生及夫人、全國基督教大學同學會、方潤華博士、馮燊均先生、何厚鏵先生、何善衡博士、何鴻燊博士、江海傑博士、劉佐德先生、劉百成先生、李兆基博士、梁紹榮太平紳士、李福全先生、邵逸夫爵士、郭炳湘先生、宋常康先生、利國偉爵士、伍絜宜博士、胡順謙先生、伍宜孫博士及葉元章先生等。









香港浸會大學林思齊東西學術交流研究所創辦於一九九一年十一月，宗旨是促進海內外東西學術交流研究活動。研究所的各項活動以東西方關係、語言、文化、經濟、學術之研究爲主導，肩負促進東西方溝通的使命，致力推廣國際文化交流。



本書是根據本港著名政治評論家黃文放先生於一九九七年五月在浸會大學講述「中國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的決策歷程與執行」的演講錄音輯錄而成。

黃文放先生是前任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秘書長。八十年代初，廖承志根據鄧小平的指示，組織收回香港主權政策研究小組，向中央提出收回香港的具體方案，黃文放是五人小組成員之一（組長是魯平），在此次演講中，他親身闡述當年北京高層關於香港問題的重要決策歷程。

浸會大學林思齊東西學術交流研究所將演講內容出版成書，並有中、英文版本，作爲香港回歸中國的歷史紀錄文獻，極具參考價值，海內外人士可以藉此更了解中國對香港問題的決策，從而探討香港邁向歷史新階段的契機。

ISBN: 962-8027-04-2
香港浸會大學
林思齊東西學術交流研究所

HK$68. 00